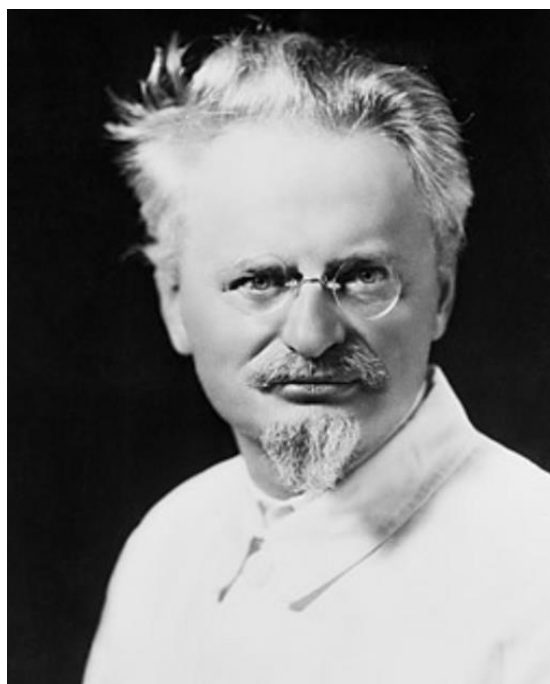




世紀明燈：紀念托洛茨基遇害 80 周年

托洛茨基：出路 (1934)

托洛茨基：為第四國際而鬥爭 (1935)

名為保勞工就業，實則保財團進帳

大洪水、城市化與氣候變化

現在讓我們向生態社會主義過渡吧

階級和種族不平等、健康和 COVID-19

名為保勞工就業，實則保財團進帳

韓則鳴

新冠肺炎疫情連番衝擊，香港政府數度推出保就業計劃，可惜，成效有限，深究其原因，乃名為保就業勞工，實則保財團錢袋。

根據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五批名單，領取補貼超億元的僱主包括國泰航空有限公司，獲發4.58億元補貼，居於榜首，惠康、萬寧、美心、7-Eleven等的母公司牛奶公司，獲得3.99億元位居第二，長和系旗下的百佳超級市場則獲1.62億元補貼，多間大型連鎖食肆榜上有名，如大家樂企業有限公司獲得2.28億元補貼，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領取9,143萬元補貼。同樣有超市的AEON百貨和一田百貨則分別獲補貼近6,000萬元和2,978萬。相比之下，惠康和百佳領取的補貼遠超於其他超市。

保就業計劃五批名單

首10名最多補貼的僱主(截止7月21日)

僱主名稱(中文)	工資補貼金額 (2020年6月至2020年8月)	承諾受薪僱員人數	每位僱員每月補貼金額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HK\$458,206,656	17,703	HK\$8,628
牛奶有限公司	HK\$399,558,579	21,611	HK\$6,163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HK\$324,076,584	12,590	HK\$8,580
大家樂企業有限公司	HK\$228,543,621	12,640	HK\$6,027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HK\$161,952,324	8215	HK\$6,571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HK\$136,559,307	5780	HK\$7,875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HK\$118,978,020	4804	HK\$8,255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HK\$115,103,148	5,612	HK\$6,837
中國海外建築有限公司	HK\$100,701,141	3,750	HK\$8,951
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	HK\$91,433,592	4,138	HK\$7,365

資料來源：政府保就業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引用美國駐港領事館農業貿易辦事處數據，全港十大超市共有店舖737間，惠康約有320間，百佳有270間，以店舖數目計，兩間超市佔了8成，換言之，形成怡和系(惠康)和長和系(百佳)兩大財團壟斷的局面。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超市在今年5月的銷售額為47.45億，6月跌至46.59億，但若把頭半年銷貨總值與去年同期比較，則升10.6%。其他食品店亦受惠，新鮮或急凍魚類及禽畜肉類零售商的1至6月銷貨總值更比去年同期飆15.2%。當下疫情對超市衝擊較小，甚至得益。李兆波批評：“1至6月超市銷售額按年大增10.6%，根本沒裁員壓力，反而有增聘人手需要。政府代付工資，企業在利益最大化下，即使有錢賺也照申請，結果出現了公帑資助了沒裁員壓力的行業、資源錯配現象。”他分析：“根據統計處的資料，6月的總零售銷貨為265億元，超市佔46.6億元，超市的銷貨額在這幾個月來基本上是維持在去年同期每月40多億元的水平，而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藥物及化粧品兩項的下跌幅度相當大，超過50%，在這時勢，不跌反有10%增幅的超市，肯定是受惠者。”

另一方面，人力資源專家周綺萍指出，保就業實際上是保企業，認為政府對失業人士的援助不足。即便失業率持續上升，家庭月收入減少，政府至今沒有任何失業救濟金計劃。據政府最新統計，2020年4月至6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6.2%，較去年第二季，即爆發社會運動及疫情前的2.8%，創逾15年新高；就業不足率則高達3.7%，屬近17年來的高位。從事零售、住宿及膳

食服務行業的失業率達10.1%，佔整體失業人數的27.1%；當中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失業率達14%。其他失業「受災區」包括建造業，失業率達11.2%，佔整體失業人數16.9%。

全港有約48.7萬人月入低於1萬元；至於1萬至1.99萬元的群組，佔119.7萬人，屬於人數最多的一群。全港約有264萬戶，家庭月入只有25,000元以下的戶數普遍增加，其中月入1萬至1.5萬元的家庭戶數，由去年次季的21.9萬戶，增加近一成至24萬戶。與此同時，家庭月入2.5萬至10萬元的戶數，則普遍減少，其中月入2.5萬至2.99萬元的戶數，按年大減12.57%。



首期保就業計劃明顯庇護財團而引發爭議，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政府在檢視落實第一期計劃後，將要求20多間大型物管公司收到補貼後，回饋至少八成給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兩大超市需為顧客提供減價，向弱勢社群提供現金購物券。

李兆波則一針見血指出漏洞，先提高標價再減價，實際上與原價無異，如何確保超市真減價？減價貨品是否集中在食物、蔬果、民生日用品，而不是酒類和貴價貨品。超市在派發現金購物券時，如何確保公平分配給弱勢社群？

根據明報記者實地調查灣仔超市包括百佳、惠康及華潤旗下的U購select，抽取5款食品觀察價格，包括白米、醬油、即食麵、午餐肉及汽水。結果發現貨品價格相差較大，如三花午餐豬肉340克裝，百佳賣21.9元，惠康賣18元，U購select只需14元；3家超市的1.25公升裝可樂均售11.5元。據消委會「網上價格一覽通」，過去30日以上產品在百佳及惠康都沒有價格變動。

簡言之，政府必須停止向大財團進貢，並且將大財團因壟斷市場不勞而獲的財富，還富於民，惠及基層。

參考：

1. “數讀香港：失業率恐再升，政府仍拒「失業援助金」”，《思考香港》，2020-06-15。
2. “失業率 6.2% 創 15 年新高”，《香港經濟日報》，2020-07-20。
3. “第五批名單出爐，牛奶公司百佳大家樂各領取逾億補貼”，《香港 01》，2020-07-21。
4. “回饋社會同舟共濟，超市要「真減價」”，《香港經濟日報》，2020-08-19。
5. “超市食品店「疫」市生意升，逾一成市民稱無期望：最多九五折”，《明報》，2020-08-19。
6. “抗疫基金要求超市回水的「亂局」”，《香港經濟日報》，2020-08-24。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7卷第1/2期（總第248期）

2020年9月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大洪水、城市化與氣候變化

青岩

大洪水

2020年9月3日，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兼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報告，今年中國氣候年景總體偏差，雨情汛情多年罕見。

今年汛情最為嚴重，主要有“三多一長”的特點。一是降雨量多。全國平均降雨555.6毫米，較常年同期多10.58%，為1961年以來第二多雨年份。降雨量僅次於1998年。特別是6月份進入主汛期後，全國平均降雨375.3毫米，較常年同期多13%，且極端性強、雨區穩定重疊。二是超警河流多。全國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751條河流發生超過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48條河流發生超過保證水位洪水，72條河流發生超過歷史洪水位洪水，較近年明顯偏多。三是大江大河和流域性洪水多。長江、黃河、淮河、珠江、太湖流域發生18次洪水，長江、太湖發生了流域性大洪水，其中長江上遊發生了特大洪水，淮河發生了流域性較大洪水，1998年之後，一年之內有三大流域同時發生流域性較大及以上量級洪水的只有今年。四是江河湖泊高水位時間長。

今年洪澇災害範圍廣，全國28個省份遭受影響，共有7047.1萬人次受災，比近5年同期均值上升17%。二是直接經濟損失上升。洪澇災害持續時間長，一些地方災害程度深，農田、養殖、城鄉工商戶、基礎設施等受損嚴重，直接經濟損失2143.1億元，較近5年同期均值上升27%。三是轉移群眾數量上升。全國緊急轉移安置469.5萬人次，較近5年同期均值上升47.3%，為近年來最多。四是死亡失蹤人數下降。因災死亡失蹤人口271人，較近5年同期均值下降49.8%。五是倒塌

房屋數量下降。洪澇災害造成7萬間房屋倒塌，較近5年同期均值下降57.5%。

目前已累計下撥中央救災資金25.75億元，緊急調撥19.5萬件中央救災物資和總價1.34億元的防汛物資。中央財政對受災較重省份倒塌和嚴重損壞民房，在現行每戶2萬元補助標準的基礎上，每戶再增加5000元。

城市化越高，防洪越困難

根據《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佈圖集》，1470至2018年549年間，中國沒有一年沒出現大澇，區別只是，有些範圍大，有些則局地性明顯；且出現頻率呈現明顯的年代際變化特徵，以2-3年左右的週期為主，還有11年左右、22年左右、50-60年左右以及80-100年左右的“世紀週期”。那麼，這是否說明大洪水頻繁乃天災而非人禍？

成都市金堂縣10年來已經連續發生2013年、2018年和2020年大洪水，成為有名的水患之地。因洪水損失慘重的還有樂山市，四川省內經濟總量第八大城市，2019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863.31億元，其常住人口為327.1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174.5萬人。按照此資料計算，樂山市的防洪標準應該為第二等級，即100-200年一遇。

然而，全國大部分城市的防洪標準都未達到，其實，難以達標與高度城市化率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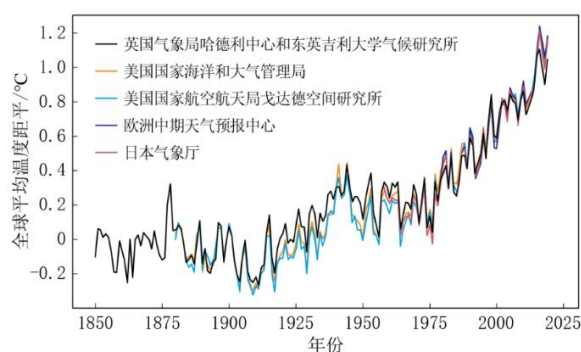
2010年，著名水利專家、原成都水務局總工陳渭忠指出，造成洪澇災害多發現象的原因與急速城市化相關。第一，城區道路地面硬化，使得降雨形成積水之後，地表水不能轉化為地

下水；第二，管道、池塘被佔用或者破壞，城市調蓄水功能降低；第三，稻田、耕地是可以蓄水的，但是城市化推進太快，佔用大量耕地稻田，也降低了調蓄水功能。以成都為例，這座城市原本是河流密佈的“水城”，這些河流對洪水調蓄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在快速城市化之後，大量河流消失，現在僅存留下一些地名。

中國氣候變化

2020年8月24日，中國氣象局氣候變化中心發佈《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以下簡稱“藍皮書”），從大氣圈、水圈、冰凍圈、陸地生物圈和氣候變化驅動因數等方面提供中國和全球氣候變化狀態的最新監測資訊。藍皮書指出，中國作為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氣候極端性增強，降水變化區域差異明顯，暴雨日數增多；生態氣候總體趨好，但區域生態環境不穩定性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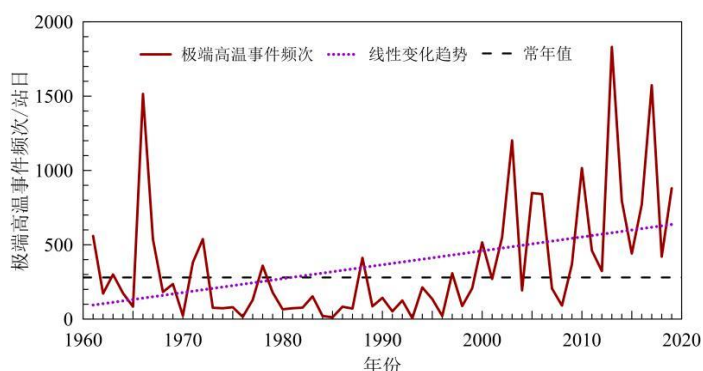
藍皮書指出，2019年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化前水準高出約 1.1°C ，是有完整氣象觀測記錄以來的第二暖年份；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個連續10年都比前一個10年更暖。2019年，亞洲地表平均氣溫為20世紀初以來的第二高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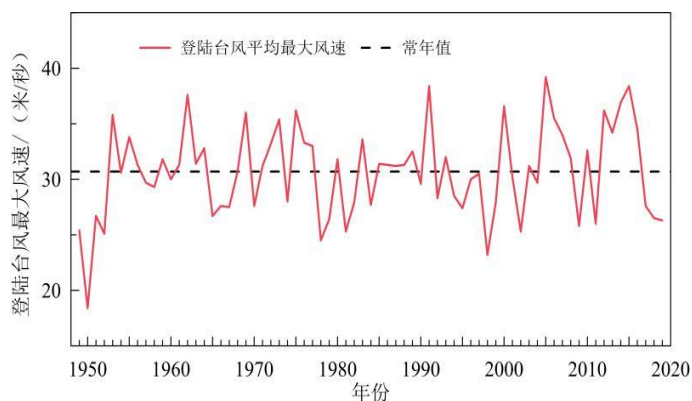
1850～2019年全球平均溫度距平（相對於1850～1900年平均值）

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影響顯著區。1951～2019年，中國年平均氣溫每10年升高 0.24°C ，升溫速率明顯高於同期全球平均水準；

近20年是20世紀初以來的最暖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極端高溫事件明顯增多；2019年，雲南元江（ 43.1°C ）等64站日最高氣溫達到或突破歷史極值。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登陸中國颱風的平均強度波動增強；2019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颱風生成個數為29個，其中6個登陸中國；超強颱風“利奇馬”為1949年以來登陸中國的第五強颱風，且登陸後移動緩慢、陸上滯留時間長，風雨強度大、影響範圍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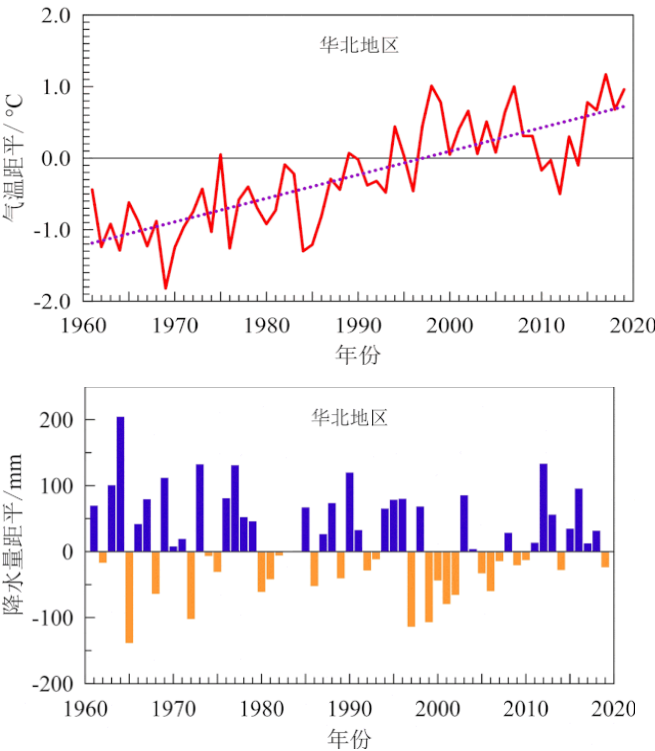
1961～2019年中國極端高溫事件頻次變化



1949～2019年登陸中國颱風平均最大風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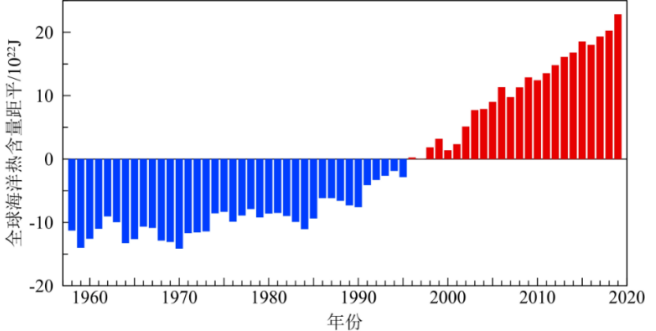
降水變化區域差異明顯、暴雨日數增多。1961～2019年，中國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趨勢，平均年降水日數呈顯著減少趨勢，極端強降水事件呈增多趨勢，年累計暴雨（日降水量 ≥ 50 毫米）站日數呈增加趨勢，平均每10年增加3.8%。1961～2019年，中國各區域降水量變化趨

勢差異明顯，青藏地區降水呈顯著增多趨勢；西南地區降水呈減少趨勢；其餘地區降水無明顯線性變化趨勢。21世紀初以來西北、東北和華北地區平均年降水量波動上升，東北和華東地區降水量年際波動幅度增大；2016年以來，青藏地區降水量持續異常偏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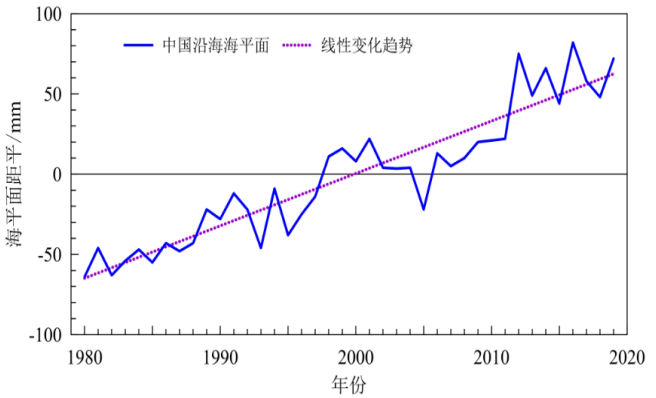
1961～2019年中國八大區域年平均氣溫距平和年降水量距平變化（點線為線性變化趨勢線）

1870～2019年，全球平均海表溫度為顯著升高趨勢；2019年，全球平均海表溫度為1870年以來的第三高值。1958～2019年，全球海洋熱含量（上層2000米）呈顯著增加趨勢，且海洋變暖在20世紀90年代後顯著加速。1990～2019年，全球海洋熱含量增加速率為 9.6×10^{22} 焦耳/10年，是1958～1989年增暖速率的5.6倍。2019年，全球海洋熱含量為有現代海洋觀測以來的最高值，較常年值偏高 22.8×10^{22} 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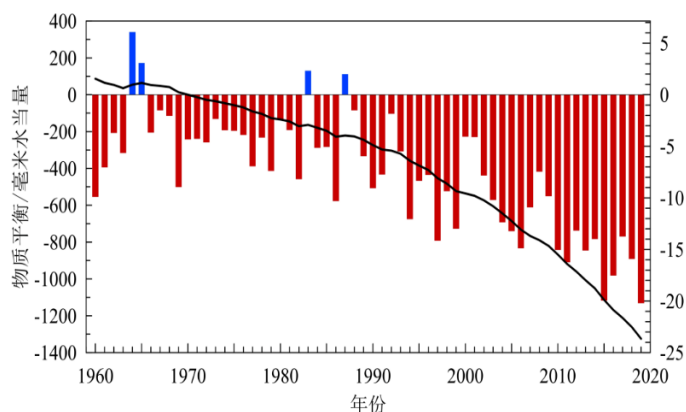
1958～2019年全球海洋熱含量（上層2000米）距平變化

全球平均海平面呈加速上升趨勢，上升速率從1901～1990年的1.4 毫米/年，增加至1993～2019年的3.2 毫米/年；2019年，為有衛星觀測記錄以來的最高值。1980～2019年，中國沿海海平面變化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上升速率為3.4毫米/年，高於同期全球平均水準。2019年，中國沿海海平面為1980年以來的第三高位，較1993～2011年平均值高72 毫米，較2018年升高24 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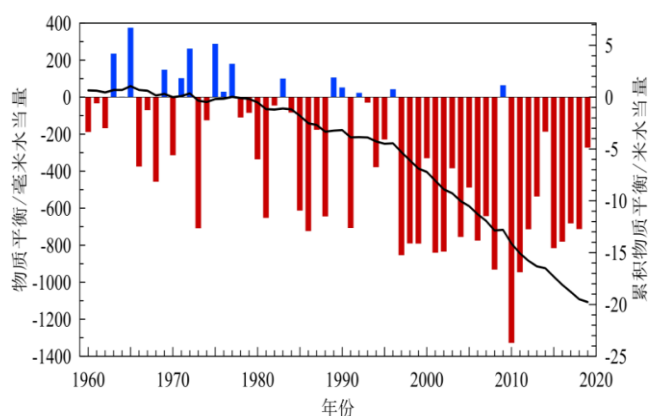
1980～2019年中國沿海海平面距平（相對於1993～2011年平均值）

1960～2019年，全球山地冰川整體處於消融退縮狀態；1985年以來山地冰川消融加速；2019年，全球冰川總體處於物質高虧損狀態，參照冰川平均物質平衡量達到-1131毫米，為1960年以來冰川消融最為強烈的年份。



1960~2019年全球參照冰川平均物質平衡（直條圖）和累積物質平衡（曲線，相對於1970年）變化

中國天山烏魯木齊河源1號冰川、阿爾泰山區木斯島冰川和長江源區小冬克瑪底冰川均呈加速消融趨勢，2019年冰川物質平衡量分別為 - 272 毫米、- 310 毫米和 - 265 毫米，物質損失量均低於全球參照冰川平均水準。2019年，天山烏魯木齊河源1號冰川東、西支末端分別退縮 9.3米和4.9米，其中東支退縮速率繼2018年後再次創下新的觀測紀錄；阿爾泰山區木斯島冰川末端退縮了7.6米；長江源區大、小冬克瑪底冰川末端分別退縮7.7米和6.7米。



1960~2019年天山烏魯木齊河源1號冰川物質平衡（直條圖）和累積物質平衡（曲線，相對於1970年）變化

結語:

2018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佈特別報告，警告全球溫度已高於工業化前水準 1.5°C ，全球升溫會導致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增加。全球氣候變暖，使地表蒸發加劇、水迴圈加快，大氣持有水的能力增加。根據克勞修斯-克拉珀龍方程（Clausius-Clapeyron equation），地表溫度每升高 1°C ，空氣中就會增加大約 7% 的額外水蒸氣，這會導致降水強度、持續時間和/或頻率的增加。

2010 年，水利專家陳渭忠警告，城市化擴張過程中，城市抗洪排澇能力降低，同樣的降雨量，或者比以前小一點，都會產生比以前更嚴重的狀況。

綜上所言，城市化加劇了氣候變化乃至惡化洪水災情，故此，逆城市化/工業化才是解決氣候變化與大洪水的關鍵所在。

解鈴還須繫鈴人。

資料來源:

1. 賽先生，“水災、蝗災、疫情與氣候變化，天災還是人禍？”，新浪科技綜合，2020-07-8，<https://tech.sina.com.cn/d/n/2020-07-08/doc-iiirczymml207147.shtml>
2. “四川為何遭遇大洪水？除了強降雨，還有哪些因素要關注？”《第一財經》，2020-08-21。
3. 中國氣象局，“《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發佈：氣候系統變暖加速”，新浪網，2020-08-24，https://k.sina.com.cn/article_2117508734_7e369e7e02700vauk.html?from=science
4. “《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顯示氣候系統多項指標呈加速變化趨勢”，《中國氣象報》，2020-08-28，[8/t20200828_561906.html](http://t20200828_561906.html)
5. 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09-03，<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20zccfh/24/index.htm>

現在讓我們向生態社會主義過渡吧！

第四國際



1 ▶ 我們身處重重危機中，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這是自二十世紀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我們正在與影響所有人的冠狀病毒大流行作鬥爭。針對這個病毒，（到目前為止）沒有疫苗，沒有已經證實的和安全的抗病毒治療法；今天，我們只能加大人類的社交距離來減輕其影響，打破病毒的蔓延鏈。當我們被隔離時，我們的唯一保護是公共衛生系統、收入和權利的保障以及團結。雖然許多企業家只尋求獲得利潤，但在這場正在走向蕭條的經濟衰退中，每個國家的統治者都試圖以犧牲鄰國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他們的利益。但是，在大家的相互混戰中，在尋求替罪羊的鬥爭中，加上已經存在的不平等、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我們無法擺脫長期流行病；我們只有確認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權利和團結，才能克服這場危機。這是國際主義、社會、種族、性別和環境正義、捍衛人類共同命運的時候。

2 ▶ COVID-19 是新自由主義的流行病，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階段的產物。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已經擴展到了整個地球。全球生產鏈為企業提供增加利潤，也使每個國家變得脆弱，容易受到最輕微的危機的影響，而維持這些鏈的超流動性，消除了任何健康和生態安全機制。以使用化石燃料和大

型資本主義農業為基礎，與自然的掠奪性關係及其綠色沙漠，破壞了地球系統基本週期（碳、水、氮）的平衡，破壞了人類與生物圈的關係，而我們只是這個生命網的一部分。這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目標是在有限的星球上無限增長，超越了地球的所有極限，造成了生態異化，造成了與合理使用普通商品不相容的消費需求。

3 ▶ 如果所謂的“自然”災害是氣候危機的後果，那麼SARS-CoV-2及其可能的突變也是對地球生物圈攻擊的結果。砍伐森林、環境退化和商業/“再生”獵殺野生動物不斷為人類沒有免疫抗藥性的新疾病創造條件。肉類消費的加速增長與最近的病毒爆發密不可分，因為肉類行業涉及將大量基因相似的動物關起來。在世界許多地區，森林砍伐和遺傳變異性喪失的主要驅動因素是：農業已經佔可居住土地的一半，77%的農業面積專門用於放牧土地或可耕地來生產動物糧食。需要對我們的糧食生產系統和飲食進行深刻的變革，以便克服這一流行病產業！

4 ▶ 全人類都受到病毒的攻擊。被剝削階級和被壓迫階層受影響最大。住在危房中的家庭、惡劣的衛生社區、不穩定工作的工人、那些收入僅能糊口的家庭。衛生工作者（醫生、護士）、不能停止輸送供應品的卡車司機和運輸工，所有那些必須推動世界齒輪的人，他們都會受苦。換句話說，這一流行病影響到每個人，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這取決於他們的社會階層。但是，也有世代的影響；病毒殺死了各個階層的老人。在人類社會的這一範圍內，貧窮的老年人是死亡最多的人。危機正在嚴重打擊婦女，她們負責社會再生產的大部分工作，她們被關在家中，工作負擔更大，正在遭受另一種流行病，即家庭暴力。

5 ▶ 更嚴重的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局勢。在不同的條件和情況下，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東亞和印度次大陸的國家都受到了這一流行病的影響。在這些國家還處於初期階段，一切都表明，

這一流行病與衛生條件差、缺乏基本衛生設施、極其密集的城市、街區和地方政府以及不願採取社會保障措施的統治階級相結合，必會造成一場真正的人道主義災難，其規模仍在發展，在這次大流行中的情形尚未知。在阿爾及利亞、埃及和南非等非洲國家，在秘魯、厄瓜多爾、印度，特別是在巴西大城市的貧民窟，這種流行病正在蔓延，表明非白人正在經歷大得多的危險，按照使數十億人處於貧困之中的資本主義統治邏輯，他們在許多方面是低等的。現在有必要集中力量，呼籲與全球南方國家進行經濟、社會和人道主義的團結，以此防止種族滅絕中心流行病毒在土著人民、農民、貧窮工人、黑人、達利特人中間蔓延，阻止其在現代新殖民主義形式下仍然被種族化被種族排斥的所有人之間蔓延。

6 ▶ 仍需要高度關注資本主義週邊及全球南方的極右政府所採取的威權措施。印度、菲律賓和厄瓜多爾政府支持的鎮壓和獨裁措施，就是COVID大流行病如何被用來深化獨裁措施和進一步加強政權的例子。杜特爾特宣佈，他將槍殺那些不遵守隔離規定的人，在厄瓜多爾，貧困工人的住宅已被員警入侵。

7 ▶ 病毒突出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和邪惡，並表明解決這些矛盾和罪惡的唯一途徑，是與另一個系統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另一種關係。一切都有問題；制度有問題...

→ 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階段，放棄了國家為保證工人的生產力而必須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是工人在二十世紀贏得的社會權利。新自由主義將這些服務私有化，使國家更加無法滿足民眾的人類需求。如果不打擊整個制度及其行為，就不可能對化解這場危機。

→ 衛生系統的新自由主義私營化，主要為那些有能力負擔其服務的人提供服務，無法滿足人類的生活需要。衛生系統社會主義化是有必要的。

→ 新自由主義使勞資關係混亂，使之更加不穩定。因此，保障雇員和自營職業者的收入機制，以及發展收入再分配機制，是當今的核心要求。

→ 闡明全球化的破壞性，以及因為受制於企業公司及其全球生產鏈而導致的社會脆弱性，這場危機重新增加了這樣的可能性，即質疑目前國際分工的總體組織，這種分工在社會和生態上是不可持續的。

→ 新自由主義通過消費主義、個人主義行為而得以加深。但是，危機正在讓社會重新認識到，社會團結是生存所必需的。

→ 反科學的意識形態、蒙昧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重新出現，用羅奈爾得·雷根和布希的理論來證明和維持這種統治，現在由特朗普、博爾索納羅、杜特爾特、莫迪繼續..... 但他們的否認主義行為，越來越清楚地與科學假設相衝突，變得不得人心。各國政府被迫以不同的時間尺度和方法採取措施減輕危機，有時與強制行動相結合。然而，一些領導人，如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堅持其蒙昧主義和否認主義的抵制。

→ 危機使一切受到質疑。各國政府為遏制這一流行病而正在採取的（往往不足的）緊急措施，必須客觀地挑戰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為了拯救生命，我們必須攻擊整個資本主義結構。如果全力這樣做，人類和地球將得救。

8 ▶ 在大流行病出現之前，工人和人民就活生生地面對著這個系統。在智利、黎巴嫩、美國、印度等許多地方，2019年全年的群眾活動有所上升。婦女、年輕人和環境的運動在重建強烈戰鬥的國際主義——事實上，這是自1960-1970年代以來最強烈國際主義的衝動。他們面臨著的，是日益專制和極權主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是傳統資產階級政權的危機，破壞性日益加強的資本主義的需求、以及生命和自然掠奪者的產物。正是這些政權試圖引導群眾不信任人民自己的力量和團結，而相信那些宣稱反科學的救世主。此時此刻，這些人，就是想利用這一流行病加強極權主義的人。街頭行動現在被制約，但戰鬥不只是在街上。在團結意識的背景下，新的抗議形式，使用新方法來爭取公眾輿論，這些活動正在增加。

9 ▶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政府被迫採取極端措施。我們必須捍衛打擊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形式與實質的措施：

- 採取衛生措施應對這一流行病並挽救健康；
- 儘管身體隔離，但有保障的工作：對暫停活動的工人，包括不穩定工人、臨時工、家庭傭工、自營職業者和季節性工人的工資，企業和（或）國家承擔100%的責任，他們沒有任何義務要去休假或隨後補完那些未工作的時間；
- 對於非正規部門的工人、無報酬的失業者、學生、每個需要它的人，國家必須提供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必須讓他們足以過上體面的生活。
- 禁止所有解雇，並恢復自大流行開始以來被解雇的員工，
- 拒絕任何中止包括罷工權在內的社會權利的強制和法外的措施；
- 知情權和通信權；
- 為殘疾人士、老人和所有被禁閉而與社會隔離的人提供適當的社會照顧，
- 特別是在已決定封閉的國家，立即為遭受暴力的婦女和兒童採取緊急保護措施，並迅速決定驅逐暴力配偶，或為受害者提供替代住房，
- 弱勢援助
- 全體人民的平等待遇
- 立即將合適的工業（汽車、飛機、武器、.....）轉換，生產有助社會應對健康危機的產品：呼吸機、監測、重症監護床、防護設備；
- 免費分發藥品、預防用品並固定價格
- 改善關鍵領域的工作條件
- 在公共利益的控制下，使保健服務及其重建

社會化，新自由主義正在瓦解這些服務；

- 製藥業的國有化；
- 捍衛大眾的經濟和住房；
- 通過公民參與的公共債務審計，從拒絕/廢除非法部分的角度，立即暫停償還公共債務；
- 凍結銀行債務、小額信貸和租金，確保每個人的水、電、煤氣和互聯網；
- 對銀行不給予補償，將銀行體系置於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銀行系統在公民控制之下實現社會化
- 對巨額財產徵稅。



10 ▶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等待政府採取行動，我們必須採取集體行動，發展抗疫地區、農村和城市的勞動人民的自我管理倡議。有些舉措倡議的例子，來自百姓或有組織的部門，如農民、土著、失業者、大城市郊區的人民和社區、女權團結網路等。這些舉措正在創造非常有趣的替代方案，例如集體製作布面具捐贈給民眾，以預防傳染、捐贈和替代性食品生產、捍衛公共衛生系統以及普遍獲得這種系統使用的需求、保障勞工權利和支付工資的要求、譴責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升級，以及由婦女在家裡隔離期間提供的艱巨的護理工作等。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總結這些倡議，並指導這些自主自治組織每天的替代辦法，作為我們提議的生態社會主義和福祉的一部分，作為資本主義的

具體替代辦法，因為資本主義摧毀生命和地球，是一個種族滅絕和生態滅絕系統。

11 ▶ 在尊重必要的身體隔離，遵守這一規定條件的緊急措施的同時，工人和廣大民眾有行動戰鬥的手段。在巴西，“卡切羅拉索斯（cacerolazos）”和有100多萬簽名的請願書，要求彈劾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是團結的感覺轉化為團結覺悟的例子，這導致人民為採取必要措施而鬥爭。如果食物不夠，我們通過電話和互聯網，通過社區組織自己，在社區花園裡種植莊稼，有意識地消費農民合作社生產的糧食。此外，受歡迎的餐館可以變成熟食或生食的配送中心。如果收入保障政策不夠，則有可能要求市政當局發放津貼。應鼓勵各種形式的大眾創造力。

12 ▶ 儘管其程度嚴重，COVID-19大流行遠非“完美風暴”。我們的食物體系和我們與大自然的掠奪性關係，最終可能引爆病毒，這些病毒可能比SARS-CoV-2更具傳染性和/或致命性。此外，猛烈爆發可能與氣候混亂引發的極端事件同時發生。嚴重的洪水或強烈的颶風/颱風最終發生，迫使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人突然撤離，從而完全破壞對抗嚴重流行病的必要的社會隔離/檢疫措施。衛生和氣候危機的結合，可以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同時，流行病和氣候/生態緊急情況也有相似之處：迅速採取行動至關重要，必須嚴厲遏制（傳染和排放）指數增長，只有公正、公平、反資本主義的解決辦法，才能成為拯救最多生命的替代方案。

13 ▶ 地緣政治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這將重塑世界的面貌。但是現在，要求被強加了：世界各地的戰爭休戰。現在是加強各國人民團結的時候了！

14 ▶ 人們注意到，COVID-19造成的危機對環境產生了積極影響。觀察到氣溶膠和一氧化二氮等短期空氣污染物濃度下降，特別是在大都市地區，這導致空氣品質、能見度等改善。但就二氧化碳等持久性污染物而言，SARS-CoV-2危機只是表面的劃傷。目前，超過一半的國際航空停

飛，包括電力和運輸在內的能源使用量減少，估計全球排放量將減少約5%，這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史以來最大的年度下降。然而，要使氣候系統保持在允許的軌道上，也就是限制全球變暖的程度，只比工業化前全球平均地表溫度高1.5°C，這樣的年度減排率（為了到2030年將排放量減半，每年需要減少6-7%的排放）仍然是不夠的。但資本主義企業的預期是儘快恢復以前的形勢和經濟增長...此外，在一些國家，如巴西，二氧化碳的主要來源是土地使用的變化，有證據表明，在SARS-CoV-2危機期間，環境監測的脫節導致森林砍伐和排放量的增加。只有持續和有組織地努力減少能源需求，保護森林和土著土地，減少排放，才能對氣候緊急情況作出適當反應。對SARS-CoV-2危機可能“積極的環境影響”的幻想，充其量是幼稚的，最壞的情況是，可能為不幸的、優生生態法西斯主義的言論打開大門。人類社會需要深入的重組。

15 ▶ 如果在新自由主義的開端，有志向的運動和社會階層走到一起說，“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今天我們必須團結起來說，“另一個世界是必需的和緊迫的”！

通過共同的國際主義行動，指引我們走向一個世界的道路，在這個世界裡，生命價值超過利潤的，在那裡自然不再是商品。目前的危機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生產的很大一部分純粹是掠奪性的，完全是多餘的和浪費的。危機還表明，大量減少的工作時間可以生產基本貨物，保障工資和收入，以及普遍使用保健和教育系統，在過渡制度中是完全可行的，在過渡制度中，能源和生產系統被完全取代，龐大的工人隊伍轉移到與生態社會主義過渡相適應的不同經濟部門；大規模的工業調整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範圍內根據政治意願進行。

沒有向生態社會主義的過渡，就沒有未來。讓我們一起來建立和克服！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20年4月16日，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532>

階級和種族不平等、健康和COVID-19

K曼

關於COVID-19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率的人口資料，媒體的收集和報導側重於年齡和某種程度上的性別。雖然關於失業造成的大規模困難，也有普遍的報導，但我們很少聽到關於階級或種族的冠狀病毒染病率或死亡率。儘管如此，有明確證據表明，階級及種族同健康及疾病一般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染病率、恢復率和死亡率，很可能密切反映出各國內部以及富國和窮國之間的階級分化。個人和家庭收入，一般地反映了階級結構，是不同階層如何經歷這一流行病及其後果的關鍵因素。工人、窮人和有色人種可能比有更多特權的階層和種族群體遭受更大的痛苦。

社會學家、社會流行病學家和其他研究人員早就注意到階級、種族和健康之間的密切聯繫。然而，關於COVID-19、中國和意大利的兩個案例報導的較多，但是，對於我們當前危機中的階級或種族問題，那些報導幾乎沒有涉及，關於階級的收入或其他指標的資料，要麼沒有收集，要麼沒有公佈，而且兩國都沒有美國那樣的分層種族結構。雖然病毒通過人與人的密切接觸或者與受感染表面的互動而傳播，這是沒有階級區別的，但是那些病人的模式、他們的恢復率和死亡率很可能與社會階級有關。更多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出中國和意大利明顯的階級分化。隨著疫情的展開，我們可以預期，美國社會流行病學的模式，將明顯地沿著種族和階級路線進行。通過比較收入資料與衡量嬰兒死亡率以及預期壽命等健康指標的資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階級結構和階級不平等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又能看到健康和疾病率之間的聯繫。這些僅是一般的估計，因為收入並不是衡量社會階層的完全指標。

日益增長的階級分化

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急劇加劇。雖然這顯然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困難，特別是自1980年代以來，國民收入較低級別的80%的工薪階層的國民收入比例減少，高端與底端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本身就是生活設施，例如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設施，品質下降進一步加劇的因素。像理查·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這樣的社會學家認為，社會不平等程度比GDP更加決定人類的健康（威爾金森[Wilkinson]，1996年；（威爾金森[Wilkinson]和皮克特[Pickett]，2008年）。研究人員經常使用基尼係數來衡量各國之間的不平等，計算收入不平等的尺度為0 - 1；完全平等的社會得分為0.0，而完全不平等的社會，即所有財富都屬於上層，得分為1.0。美國目前得分為0.49，是全球北方國家中總體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中國得分為0.55，意大利為0.33分）。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在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是由於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減免、工會組織率下降、新自由主義的管制放鬆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幾乎所有這些收入都聚積到資本家利潤裏，而不是更高的工資。與此同時，從1990年代以來，至少五分之三的工薪人口的工資和薪金處於停滯狀態中。

聯邦政府收集的收入資料將賺取工資的人口劃分為20%的區段，通常稱為“五分區段”，顯示每個區段階層總收入的百分比。總體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收入最高的20%工薪階層的收入所占比例急劇增長，最後兩區段的比例已經萎縮，中間部分的比例停滯不前。工人大致可

以說佔據了收入階梯的下層五分之三。五分之一最低區段的人的收入，1980年占總收入的4.3%，2000年占3.6%。佔領華爾街運動通過針對1%的階級，呼籲人們注意階級不平等。1%的人確實吞噬了收入中越來越大的比例--- 17%和財富，近年來為34%。但前10%和前20%的人也增加了他們的工資財富份額。頂層20% 的人的收入占1980年工薪的43.7%。到2000年，他們的份額增加到49.6%，到2010年略多一些，略高於51%。到那時，最大幅度的漲幅進入到了百分之一的人的手裏。

讓我們快速看看收入等級的底層，那些佔據底層20%區段的人們，尤其是收入水準最低的人。美國政府根據食物和其他生活成本與收入計算（一個非常錯誤的公式，大大低估了真正的食品和生活成本）貧困線。目前，一個四口之家的貧困線約為25000美元。目前，美國的官方貧困率約為12%，即約3600萬人。更合理的估計是25-30%左右（25%將代表8850萬人）。其中許多是兒童或退休人士，他們將不會在勞動力中。還有數百萬人稍微超過貧困線，而其實際生活條件與貧困線以下的人相似，但政府統計中卻沒有這樣的數字，沒有資格得到公共援助。對於那些符合資格的人來說，援助金被一連串的"福利改革"削減，從克林頓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幅削減福利，到特朗普政府在疫病襲擊美國之前宣佈的最新一輪削減。在工作年齡的窮人中，有長期或間歇性失業的工人，而許多其他的人是速食或零售業的低工資工人、非正規經濟成員或"gig（臨時）"工人。這些低工資工人中有許多收入低於貧困線，沒有病假、養老金或健康保險。儘管奧巴馬的醫保增加了數百萬參保者，但仍有約2000萬人沒有醫保。

階級和健康

針對美國階級結構的背景做快速檢視，我們可以查看與階級相關的健康資料。總體而言，中

上層階級的自我報告裏健康良好和優異的情況，遠遠高於低收入階層。根據社會與健康中心的一份報告，“貧窮成年人健康狀況報告中，其健康狀況一般或糟糕的成人數量，幾乎是家庭收入在聯邦貧困水準400%以上的成年人的五倍.....並且他們因慢性疾病而有活動限制的可能性是其三倍多。美國低收入成年人患心臟病、糖尿病、中風和其他慢性疾病的比率也比富裕的美國人高（Woolf等人，2015年）。”

社會的健康狀況，可以通過觀察幾個因素來衡量，如嬰兒死亡率、預期壽命、肥胖率等，更不用說多種心理健康因素了。在這裏，我們簡要地看一下其中兩個，即嬰兒死亡率和預期壽命（兩者都與許多其他因素相關）。早在1901年在英國約克發表的研究表明，階級差別、生活條件和嬰兒死亡率有明顯相關的模式。在英國約克進行了一項研究，收集了三個不同工人階級群體的嬰兒死亡率資料。這三個群體根據生活條件和收入不同，最貧窮的人生活在最狹窄和最擁擠的條件下。

在一些最貧窮地區，嬰兒死亡率最高，為每1 000名活產嬰兒中有247人死亡，每1 000活產嬰兒中有184人死亡，以及每1 000活產嬰兒中為173人死亡。研究指出，居住在最清潔、最不擁擠的社區和家庭的公務員的嬰兒死亡率為94。對21世紀人口的研究揭示了相同的相關性。根據200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2000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在父親屬於頂級社會階層的活產嬰兒中，嬰兒死亡率為每1 000人死亡3.7人，生於在最底層社會的嬰兒，死亡率為8.1人。在單身母親中，這一比率為7.6。.."（國家統計局，2001年）。

預期壽命也是衡量人口整體健康狀況的主要指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全球平均預期壽命為72歲。所有預期壽命最長

的國家都位於全球北部，日本和香港84歲以上，位居榜首，而所有壽命最短的國家都位於全球南部。中非共和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為52.8歲。

根據無黨派的國會研究局(以撒斯[Isaacs]和喬達裏[Choudary]，2017年)的報告，在美國，"1960年出生的男性，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其壽命可能比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男性長12.7年"。所有這些都表明，一般來說(除個別例外)，越窮，他們預期的健康就越差;而，越富，他們可以預期的健康越好。甚至有證據表明，在1%的人中間，上半部分人比下半部分的人健康更好。

種族和健康

種族也與健康和疾病密切相關，但相關性比階級少。非裔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白人低得多，而其嬰兒死亡率高於白人。美國的總預期壽命約為78歲。大多數研究發現白人和黑人之間一般有4-5年的差距。男性黑人平均壽命比男性白人少9年左右。在美國，根據疾病控制中心(CDC)的資料，非裔美國人的嬰兒死亡率(百分比)(以嬰兒在一歲前無法存活的人數來衡量)，為11.4%，而白人的死亡率為4.9%。

有色人種社區的人們健康狀況不佳，這個情況反映了黑人、拉丁人、亞洲人和土著人種族和階級的重疊，他們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在窮人隊伍中所占比例過高。根據標準資料集，黑人和拉丁裔人生活在貧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過去幾年大部分時間，黑人和拉丁裔的貧困率一直在25%左右，而白人的貧困率為8%)。黑人的糖尿病發病率遠遠高於白人，而糖尿病則使人面臨明顯的冠狀病毒風險。研究表明，種族與健康之間的聯繫弱於階級與健康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高收入的黑人、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比其收入較少的相應群體成員的健康更好，而且這種收入梯度同健康的聯繫，似乎比他們

的種族或民族更強。(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2015年)。

非裔美國人的高監禁率也會導致黑人社區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升，因為監獄是傳染病傳播的溫床，而監獄醫院更沒有能力應付突然湧入的病人。在這次危機中，有色人種在與各級衛生保健工作者(包括與醫生)的互動中，經歷了大量方式的文化種族主義，將繼續惡化有色人種的狀況。而且，與貧困、營養不良和不平等有關的所有問題，在不衛生和擁擠的移民拘留中心可能會擴大。



階級、種族和 COVID-19

冠狀病毒的特殊性將加劇階級和種族差異。例如，儘管在大城市中心區所有階級的人都使用公共交通，但在某些地區，勞動人民更有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較少可能選擇自己駕駛汽車，這使得他們更容易受到感染。例如，在密爾沃基貧窮的黑人社區，每戶的汽車擁有率為20-30%，而白人和富裕地區的汽車擁有率為90%。《紐約時報》3月3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混亂的底特律，人們利用長途公共交通從擁擠的街區上班，可能是個因素，導致在黑人、工薪階層密集的貧窮的城市裏冠狀病毒感染突然激增。有一些市縣，那裏大部分的人無法使用交

通工具，在這些地方，對車內人員不下車而進行新冠病毒測試的效果會比較差。

關於在大流行期間階級、職業和自我隔離能力以及保持安全距離的資料已經彙編完畢。4月3日的《紐約時報》網路版報導，1500萬智慧手機使用者移動資訊顯示了明顯的職業和階級分劃（《紐約時報》文章沒有討論抽樣問題）。

“整個美國，許多低收入工人繼續四處走動，而那些賺更多的錢的人則呆在家裏，避免接觸冠狀病毒”。例如，“最富有的人，那些收入最高的10%的人，比同一大都市區最底層的10%的人更限制自己的行動。”

根據位於路易斯安那州東南部的一個研究小組資料中心的研究，“對收入和貧困的估量可以表明，社區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功地遵守COVID-19緩解措施（如‘待在家裏’和‘隔離生病的家庭成員’）。（資料中心，2020年3月25日）” 資料中心首席人口統計員艾爾森·普萊耶（Allison Plyer）告訴《新奧爾良太陽先驅報》（2020年4月3日），“人生活在貧困中時，他們住得更近，可能有四個人住在一居室的房子裏，”他說，“這意味著很難隔離。病毒傳播的一個主要方式是家庭成員間的傳播。”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白領往往住在更大的生活空間裏。在20世紀90年代，新建的房屋面積從1,800英尺躍升至2,400英尺，提供了更多的空間隔離生病的家庭成員（Frank，2015年）。購買這些房屋的人，很可能是第三區段上端和第四區段下端的人們。

貧窮、有色人種或兩者兼而有之，使一個人更有可能無家可歸，或住在封閉社區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大量和突然的失業和低工資，特別是在高租金地區，增加了人們生活在擁擠的生活空間的可能性，使得維持社交距離特別困難。根據許多消息來源，在這種緊張時期，生活在封閉的空間，也使婦女面臨家庭暴力的更大風險，這些消息來源，記錄了特別與COVID-19危機有

關的，針對婦女和同性戀雙性戀者（LGBTQ）人群的暴力行為激增，（《衛報》，2020年4月3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apr/03/coronavirus-quarantine-abuse-domestic-violence>

同樣，同白領工作者相比，藍領工人往往工作在更密集的場所（一些性別型職業的“粉紅領”工作，如秘書工作，也轉移到偏遠地方，而其他工作，如房屋清潔工作則沒有）。在目前情況下，白領員工從事的大量網上工作已經轉移到舒適的家庭（醫療新冠病毒患者的高薪醫生工作是一個例外），而工人階級和大多數有色人種從事的藍領工作，不能在家裏做，這導致一些人失業，而另外的人則在危險條件下工作的情況。

數字鴻溝使許多窮人和農村勞動人民以及有色人種無法獲得互聯網或高品質的互聯網，或者電腦、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他們有可能得不到最好和最新的健康相關資訊。這也損害了他們跟隨學校教學工作步伐的能力，現在這種教學工作已經轉向遠端線上形式，這將進一步加劇階級和種族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根據美國人口普查，12%的美國家庭沒有互聯網接入。新奧爾良市只有61%的家庭擁有寬頻，該市整體貧困率為23.8%（2018年），而遭受COVID-19的打擊最大。20%的人沒有任何互聯網連接（資料中心，2020年）。

據路易斯安那州資料中心介紹，中國武漢的發病率早期研究“已經查明了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 通常與吸煙有關）、慢性腎病和癌症作為預先存在的健康問題，可能會增加COVID-19感染者出現嚴重結果的可能性”（資料中心，2020年;楊，2020年）。非裔美國人，以及各個種族的低收入人群，都深受其害。底特律大約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國人患有哮喘和糖尿病。

教育與階級重疊，儘管教育是健康的比較獨立的因素，但教育是與階級相關的健康和社會不平等的另一個斷層線。目前，12%的美國人口沒有高中文憑，65%沒有大學學位。32%的白人成年人擁有大學學位，而只有16%的黑人和9%的拉丁裔擁有大學學位。

貧窮，無論怎麼衡量，通常伴隨著營養不良，這反過來又對許多（如果不是所有）健康措施有負面影響。這無疑影響到嬰兒死亡率和最終的預期壽命。營養不良與階級和種族不平等有關，很可能是有關冠狀病毒的一個重要因素。即使是一些在呼吸機短缺的情況下，考慮誰優先使用呼吸機的政策，也會反映出階級和種族不平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3月27日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稱，一封來封信認為，“患有嚴重心臟、肺、腎或肝衰竭、嚴重創傷或燒傷或晚期癌症的患者，可能沒有資格接受呼吸機或ICU護理。”相反，這些患者將接受“疼痛控制和安慰措施”。這些條件在低收入階層和有色人種社區中更為普遍。

健康護理系統的使用

美國是全球北方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療體系的國家。在美國，貧窮者和接近貧窮的人很可能沒有醫療保險，因為大多數領取醫療保險的美國人，他們工作場所的雇員超過250人，而有色人種工人更有可能在不提供保險的小型企業工作。從理論上講，失業、就業不足和不享有奧巴馬醫保（ACA）的小企業的工作者將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但許多人被排除在外，部分原因是醫療補助被削減，共和黨州長拒絕聯邦政府擴大醫療補助計劃的提議。

缺乏定期獲得保健服務會損害整體健康，並可能削弱免疫系統，因此，沒有定期獲得衛生保健的階層，可能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並遭受最嚴重的影響。

因此，階級劃分上的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獲得保健的機會受到限制，它當然在階級和健康差距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然而，全球北方其他等級分明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嚴重的健康不平等，但這些國家都有全民保健體系。最近有報導稱，英國有全民醫保，其基尼（GINI）指數低於美國（其基尼指數0.35，美國為0.49），但仍相當可觀，英國高收入階層的壽命比勞動人民和窮人的壽命長10年。究其原因，多種多樣，不能在此全部分析，但英國的例子表明，階級不平等的破壞性質和嚴重不公平性的深度和廣度。

美國缺乏全民醫療體系，既是美國階級不平等的體現，也是工人階級和窮人健康狀況較差的原因。但是，英國貧富階層之間10年預期壽命的差距，證明了當代新資本主義急劇分層的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因為處於貧窮狀態、有色人種和/或工薪階層在“正常”時期面臨職業健康危害，在目前的危機中情況更糟，這是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深深控訴。多年來，備受吹捧的高品質意大利醫療體系，一直受到新自由主義式公共衛生經費的削減，嚴重加劇了COVID-19危機。

根據一篇關於意大利危機的最近文章：

我們的保健系統被十年的資金和經費削減所蹂躪，已經虛弱不堪了。370億歐元被削減，7萬多張床消失於無形。目前，ICU病床數量僅為5,090張，而衛生部表示，要應對危機，還需要2,500張ICU病床。床位與人口的比率目前為3.6/1000，低於1998年的5.8/1000。...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削減措施的實施，這一制度日益分散到區域管理中，打破了國家管理，阻礙了國家籌資體系。這導致經濟較強的地區獲得更多的資源，而較弱的地區則落在後面。更糟糕的是，近年來，公共財政支援已經流入了日益壯大的私人醫療保健系統。因此，意大利的醫療保健系統在危機來襲時沒有

做好應對準備。即便如此，意大利衛生系統最大的優勢在於仍然是一個單一的支付者體系...(澤卡[Zecca] “Covid-19 opens up a new political period in Italy”)。



英國、法國和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類似的大幅削減公共衛生系統預算的情況，這些福利國家以前都是社會民主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現在這些福利國家充斥著新冠病毒患者。

COVID-19疫情所揭示的，全球最富裕國家的嚴重社會不平等、結構性醫療保健不平等和對醫療體系預算的新自由主義削減致命結合，有力地突顯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統競選綱領中的核心要點的必要性和及時性：全民醫保，並通過累進稅1%、10%和20%的徵收而對財富和收入再分配。他關於免費大學教育的建議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正如這裏所建議的那樣，教育與健康也密切相關。

雖然社會民主方案將解決收入不平等和缺乏全民保健制度的雙重問題，但這裏概述的階級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緊密聯繫表明，階級分化的存在，因而階級社會本身不可避免地剝奪了社會大多數人健康生活的手段。COVID-19危機暴露出的階級不平等，意味著只有消除貧困和急劇縮小社會不平等，才能為地球上所有人民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生活，這種情況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發生。

參考資料:

Data Center. 2020. “Demographics of New Orleans and early COVID-19 Hot Spots in the U.S.”

Frank, Robert H. 2015. *Inequality Matters: The Growing Economic Divide in America and its Poisonous Consequences*. New York: New Press.

Isaacs, Katelin, and Choudary, Sharmila. 2017. “The Growing Gap in Life Expectancy by Income: Recent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Age.” Urban Institute.

National Statistics, (Winter 2001) “Infant and Perinatal Mortality by Soci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2000,”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Rowntree, B.S. 20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1901),” i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Health in Britain, 1800–2000: A Reader*, ed. G. Davey Smith, D. Dorling, and M. Shaw (Bristol, England: Policy Press), 97–106.

R.G. Wilkinson,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 Wilkinson, Richard and Pickett, Kate. 2008.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oeconomic Gradients in Mort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8 April; 98(4): 699–704.

Woolf, Steven H., Aron, I., Dubay, L., Simon, S., Zimmerman, E., Luk, K. April, 2015. “How Are Income and Wealth Linked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Center on Society and Health.

Woolf, Steven H., Aron, I., Dubay, L., Simon, S., Zimmerman, E., Luk, K. April, 2015. “How Are Income and Wealth Linked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Center on Society and Health.

Yang, J., Zheng, Y., Gou, X., Pu, K., Chen, Z., Guo, Q., ... & Zhou, Y. (2020). “Prevalence of comorbidities in the novel Wuhan coronavirus (COVID-19) infe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Zecca, Antonello. 2020. “COVID 19 Opens up a New Political Period in Italy”.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20年4月15日，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ar_articulo&id_article=65285/

新冠病毒：生態觀點

艾倫·索內特

COVID-19大流行繼續在全世界迅速蔓延，而且仍然失去控制——除了有些國家，在中國的帶動下，這些國家提前果斷地（關鍵性地）採取了控制措施止住了疫情，並為這種情況做好了事先準備。另一方面，最大的政府失誤來自約翰遜和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者領導的政府，實際上他們先是充當病毒否認者，在他們的行為使得數十萬人不必要地喪生後，他們被迫遲遲承認COVID-19是嚴重威脅。

我們必須明確，這種流行病是我們面臨的全球生態危機的組成部分，必須這樣看待和處理。流行病不只是同時發生的。

流行病與地球上其他生存危機，例如污染（特別是海洋）、全球變暖和氣候混亂、物種大規模滅絕、淡水危機，以及冰蓋融化和海平面上升一樣威脅著人類。這一大流行病與這些威脅一起，反映出了人類世（Anthropocene）——一個由人類對地球的影響而定義的地質時代。

這種危險的“人群傳染性”疾病的流行是一項挑戰，只有資源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完善的政府才能應對。自由市場、小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一直暴露出其固有的致命的反動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極右意識形態殺死的人比平常多。

在英國，傑瑞米·科比恩（Jeremy Corbyn）的觀點——以及按照工黨選舉宣言的意思——在衛生和社會服務方面需要大量投資，得到了顯著證明。在去年的競選活動中，嘲笑他（以及美國的伯尼·桑德斯）是最後一個花錢者的右翼人士，他們不僅被迫食言，還被迫大力推行他們詆毀的許多政策。科比恩堅持這一點是絕對正確的。

儘管這一切為左派創造了重要機會——隨著草根集體主義和社會團結的興起——但在我看來，迄今為止，對病毒的反應沒有達到標準。

左派正確地指責政府沒有準備，行動遲來，導致數千不必要的死亡。左派正確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製造社會條件，讓這種流行病能夠大肆流行。左派還抨擊資本主義對地球的污染，工業化農業，砍伐森林，破壞棲息地，以及致使野生和馴養的動物生病。

左派正確地指出（在英國）10年來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蓄意和毀滅性的削減開支，使得英國社會容易受到這種危險的大流行病的傷害。左派譴責了約翰遜政府令人窒息的無能、其犯罪（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群體免疫政策、其在關鍵時刻的測試等級降低——以及未能向數百萬國民保健系統（NHS）和社會護理工作者提供基本的救生保護設備。

同樣明顯的是，這一流行病對經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低收入、年輕、黑人、移民和女工將受到餐館、酒店、酒吧、零售商和運輸服務等企業倒閉的沉重打擊。事實上，低收入者在已經關閉的行業工作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的七倍。根據財政研究所的資料，三分之一的底層人士中，有10%的人工作在受災最嚴重的部門，而在收入居於前10%的人中，每20個的人中只有1人（5%）在受災最嚴重的部門。[1]

有一些左派的良好回應，但存在問題。我們作為左派生態學家，不能（或不應該）把我們對這一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分析降格，只批判各國政府對流行病一旦發作如何作出充分（或其他）回應。這雖很重要，但不是根本的。

我們的起點必須是這些病原體最初來自哪裏，

是什麼促使其成為流行病，以及為什麼這些問題越來越頻繁。我們必須制定擺脫這種流行病的戰略，我們必須討論，如果我們要在今後減少這種流行病帶來的風險，必須進行什麼樣的社會變革。



大流行病不是新近才有的

這是真的，大流行病（和流行性疾病）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大約12000年前，農業的發展，導致全球人口大量增加，流行病隨之出現。在狩獵時代，流行病的傳染，因人口密度不高而受到限制。

美國人類學家兼作家傑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中這樣指出：“（人口）的積累始於大約1萬年前農業的興起，然後隨著城市的崛起而加速——這起始於幾千年前。他接著說：“為什麼農業的興起會啟動人群傳染病的演變？剛才提到的一個原因是，農業比狩獵者聚集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平均高出10到100倍。此外，狩獵採集者經常轉移營地，而農民定居，生活在自己聚集的污水中，從而為微生物提供從一條捷徑，從一個人的身體移到另一個人的飲用水裏。

進一步說：“如果說農業的興起導致微生物的

蓬勃繁衍，城市的崛起就更加了。由於人口更加密集，在惡劣的衛生條件下，人們生活條件也惡化... 另一個繁榮是世界貿易路線的發展，在羅馬時代，這些航線有效地將歐洲、亞洲和北美的人口合併為微生物的一個巨大的繁殖地。[2]

第一次有記錄的大流行病（鼠疫）是“賈斯汀的瘟疫”，發生在羅馬皇帝賈斯汀一世的統治下，時間在西元541年至542年，拜占庭東羅馬帝國。那一場流行病特別打擊了君士坦丁堡，但也打擊了地中海周圍的其他港口城市。那一場流行病是鼠疫，一年內消滅了2500萬至5000萬人。黑死病（一種腺鼠疫）在1346年至1352年間殺死了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城市化和歐洲城市的增長令其得以發展，其中一些城市失去了高達70%的人口。這些城市之間貿易交通的發展，使得問題變得全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班牙流感（錯誤的命名）疫情導致2100萬人死亡。該流感在西部前線擁擠不堪、疾病纏身的戰壕中培育，然後由復員部隊帶回家。這種流感也具有破壞特質，因為一戰期間的糧食短缺進一步削弱了工人階級，尤其是在戰前就生活在貧困中的工人階級。

愛德華·詹納發現牛痘可以預防天花，導致了疫苗接種，第一次出現了以醫療手段對抗危險流行病的可能。1959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起了一場全球根除天花的大規模運動。1980年，宣佈天花已經根除，這是迄今唯一被根除的人類疾病。

儘管現代醫學在20世紀興起，然而，今天，大多數病原體仍然佔上風，就現代人類的未來而言，今天比歷史上任何時間都更危險。

問題的根源

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應該提出以下問題：

— 這種病原體，特別是“動物”病原體——疾病、病毒、細菌和寄生蟲——一開始是如

何跨過物種分類，從野生動物傳到人類而產生的？

— 一旦發生交叉越界，這種流行病的驅動力是什麼？

— 為什麼在20世紀，這種流行病變得更加頻繁和危險，為什麼這種趨勢持續到21世紀上葉——儘管現代醫學努力遏制？

— 為了減少這種流行病的可能性和影響，必須進行哪些社會變革？

我認為，有四個主要因素推動這種情況。

第一：全球化

第一個因素是全球化，不僅是世界經濟，還有整個人類活動，大規模運輸——國內和國際——為病原體和流行病提供了高速傳播帶：特別是航空旅行。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資料，2018年定期航班乘客總數為43億人次，比上一年增加6.4%。2018年，航班起飛數目達到3780萬班次，增長3.5%。

第二：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不可接受

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拒絕我們（作為現代人類）與地球上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完全不能接受的關係。事實上，其影響是巨大的。

2016年秋季《人類學評論》上發表的題為“物理技術圈的規模和多樣性：地質前景”的研究論文中，對這種影響，做了清醒的估計。這是25名科學家小組的工作，其中包括萊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的揚·紮拉西維奇(Jan Zalasiewicz)，他是該文的通訊作者。文章表明，所謂的物理技術圈總量——即當代人類社會的物質產出/物理基礎設施/廢物（例如垃圾填埋場）的總和，包括發電站、道路、建築物、車輛、塑膠等，相當於30萬億噸——即每個活人4000噸。

關於氣候變化對危險大流行病的影響，由傑姆·本德爾(Jem Bendell)在其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他是《深度適應：導航氣候悲劇地圖》(2018年)的作者。他認為，氣候變化正使人類更容易感染這種病毒和其他病毒。

他認為：“降雨和溫度的長期變化、變異性的增加和季節的變化，對樹木和其他植被來說是不可持續的。這意味著生活在這些生態系統中的昆蟲和動物正在遭受痛苦。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已經是巨大的，我們正在經歷大規模的野生動物滅絕事件(狄阿茲 [Diaz] 等，2019年)。鳥類和蝙蝠等野生動物的總數減少，會影響我們同疾病的接觸。為什麼？由於鳥類和蝙蝠等是病原體的“宿主種群存儲庫”，而且鳥類和蝙蝠的數量較少，那麼病原體的濃度和混合性往往更高（由於遺傳多樣性降低和更容易傳播的原因）。這增加了人畜共患傳染病對人類的“溢出風險”(埃文斯Evans等，2020年)。[3]

這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論點。各種動物，野生的和馴化的，在工業規模上被人類虐待，特別是在工業化農業方面——尤其是肉類生產——為動物病毒傳染給人類創造了最佳條件。近代歷史上人類的一些主要殺手——天花、流感、結核病、瘧疾、麻疹和霍亂——是從動物交叉進化而來的，但現在大多局限於人類。

今天，每年有700億隻陸地動物(不包括魚類)，往往在惡劣的條件下被屠宰，以供人類食用。這一數字在過去50年中翻了一番，到2050年將再翻一番。其中三分之二的動物是通過集約化方法飼養的，或者飼養在貿易中所謂的“集中化動物飼喂場”(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簡稱CAFOs)。

本德爾(Bendell)所闡述的案例，很可能是Covid-19案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看來，另一個因素最終更具有決定性：這就是人類物種本身的數量和密度。

第三：城市化和人口密度

據世貿組織（WTO）稱，今天的COVID-19大流行的源頭（本德爾也接受），據信是武漢人口稠密的“海鮮市場”，在那裏，多種動物——哺乳動物、魚類和鳥類——死的和活的，包括通常不會在一起的物種，大量聚集在一處。與此同時，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一個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這些因素似乎結合在一起，為物種間傳播病毒創造了最佳條件。

COVID-19起源於蝙蝠攜帶的病毒，這種病毒使用穿山甲作為過渡物種向人類變異——這兩種物種都在市場上出售，並在現場進行屠宰。2002年，SARS病毒也是一種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中國蝙蝠中同樣流行，被認為已經通過果子狸向人類傳播。

病原體在跳躍物種之後，需要最低閾值的人類人口密度才能生存。傑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近距離接觸的人口如果少於50萬，麻疹都可能滅絕。麻疹的情況與全世界其他傳染病一樣。

世界各國政府目前正在實行的社交間隔政策，既承認人口密度所發揮的作用，又試圖找到暫時的“解決辦法”。正如紐約市長比爾·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最近所說，隨著COVID-19病例的增多，紐約市成為美國大流行的中心：“我們的敵人是人口密度：我們過去喜歡人口密度，現在卻正在殺死我們。”

北美是地球上城市化程度最大的地區，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而亞洲約為50%的人居住在城市，非洲大多數人仍然是在農村地區，2018年有4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聯合國，2018年）。

21世紀初，城市人口超過了地球上的農村人口。自那時以來，全球每年人口增長的三分之二，即7000萬人口，大型、巨型和超級城市不斷增長。今天，全球55%的人口實現城市化，預計到2040

年將上升到68%。因此，除非我們準備進行重大變革，否則20世紀是為傳染病大流行而量身定做的。

在《極端城市（Extreme Cities）》中，阿什利·道森（Ashley Dawson）指出，1900年至2013年期間，通過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的出現，人口密度遠遠超過其數量增長。[4] 雖然在此期間人口規模增長了4.5倍，從15億增至70億，但全球城市部分從2.25億人增加到36億人，增長了16倍。

第四：大城市

快速的城市化帶來了越來越大/特大的城市——比如武漢，那裏是冠狀病毒的發現地，有1100萬居民——相當於倫敦和伯明罕的總和。大城市不僅排放了大部分的二氧化碳，而且為大流行病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世界上有33個特大城市（人口超過1000萬），預計到2030年將增至43個。其中全球有21個超級城市，擁有超過2000萬居民，包括東京橫濱，3790萬，雅加達3000萬。德里2930萬，首爾2610萬，上海2540萬，卡拉奇2430萬，紐約市為2360萬，墨西哥城為2220萬。

這些城市在社會和經濟上是多樣化的。有些經濟先進，生活水準高，公共服務良好；其它則為廣大的貧困棚戶區。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其高密度人群，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危險病原體的傳染。紐約就是目前的例子。

邁克·大衛斯（Mike Davis）在《貧民窟星球》中這樣描述：“人類最終建設（人口增長）的95%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地區，其人口將在下一代增加一倍，達到近40億。事實上，中國、印度和巴西的城市人口加起來已經大致相當於歐洲和北美。此外，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讓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完全相形見拙。1910年的倫敦是1800年的7倍，但今天的達卡、金夏沙和拉各斯都比1950年大了大約四十倍。中國

——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城市化——在20世紀80年代增加了比整個19世紀歐洲（包括俄羅斯）更多的城市居民。[5]

對於貧民窟區域的擴大，這意味著什麼，關於這點，大衛斯援引[1903年聯合國人居署的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孟買（Mumbai）是世界貧民窟居住之都，有1000萬至1200萬貧民窟居民。其次是墨西哥城和達卡，各有900萬至1000萬，其次是拉各斯、開羅、卡拉奇、金夏沙、聖保羅、上海和德里，各有600萬至800萬。



結論

第一件事是，處在一個洞裏，請停止挖掘。

扭轉城市化和人口密度的過程並非易事，但我們必須開始討論。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這意味著將可持續的地球置於我們一切工作的核心。這意味著與自然的新關係和新的社會模式，避免導致更大的城市和更多的污染。這意味著拋棄被拋棄的社會，代之以一個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立足於為實用而不是為利潤進行的生產。

這也意味著穩定人口增長。意味著支持婦女的選擇權，即獲得避孕和墮胎設施的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強制執行的程式或恐嚇。這也意味著支持貧困婦女擺脫貧困的鬥爭，挑戰宗教和其他保守勢力的影響，如父權制和宗教壓力，並給予她們充分接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當然，選擇權包括生育權，有證據表明，如果有真正的選擇，出生率將下降。）

這還涉及基礎設施、我們生活方式的革命；城市的規模，我們旅行的方式，我們吃什麼。任務艱巨，但如果我們要為地球創造可持續的未來，解決我們作為現代人類和無數其他人類物種之間的矛盾，就別無選擇。

這涉及許多工作，下面是其中一些：

- 到 2030 年實現零碳排放，擁有新的綠色能源基礎設施
- 公有制的大規模擴張
- 停止砍伐森林和破壞棲息處
- 扭轉海洋污染
- 結束工業化農業
- 農業本地化以節省糧食運輸里程
- 少吃肉
- 結束把野生動物當作寵物交易、結束為制假藥或野生肉而做野生動物交易
- 遏制航空旅行的增長，引入頻繁飛行稅
- 大幅減少汽車使用，特別是化石燃料汽車

註釋:

[1]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6 April 2020 “Sector shutdown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ich workers are most exposed?”.

[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Vintage, 2005, p.205

[3] Professor Jim Bendell 23 March 2020 “The Climate for Corona – our warming world is more vulnerable to pandemic”.

[4] Ashley Dawson, *Extreme Cities*, Verso 2017, p.298.

[5]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7.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20年4月10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ir_articulo&id_article=6519

經濟危機的原因只是新冠病毒大流行？

雅各·舍費爾

自3月底以來，經濟危機開始得到普遍承認，出現了兩個主要問題：在什麼程度（甚至原因）上，新冠病毒大流行是這場危機的起點？第二：已經採用的援助計劃能否防止一場深刻而長期的經濟衰退？

儘管充足的經濟發展資料，已經公佈了幾個月（至少自2019年年中以來），但直至今天（2020年3月底/4月初），各種經濟學家——尤其是主要媒體——仍在執著于“黑天鵝”的神話。據他們稱，正是由於“非經濟”因素，尤其是首要的“不可預見”事件，新冠病毒危機，全球經濟“滑落”陷入衰退。

在討論當前危機的原因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在2018/19年出現的危機蠢動的一些證據。

2019年7月5日，德國商業報紙“金融市場世界《Finanz markt welt》”寫道：“德國工業的訂單：災難性的衰退！”然而，外來訂單的這一情形，在2018年初已經開始。2020年1月只有小幅中期升高，但僅與前一個月（即2019年12月）相比，2019年12月表現尤為糟糕，比2019年11月減少2.08%。

外來訂單是2019年德國和大多數歐元區國家（對於全球大部分經濟體也一樣）持續趨勢的預兆。實際增長繼續下降，在某些情況下，下滑進入衰退。然而，資本主義經濟需要增長2%，或更好的3%，才能“正常”運作（即維持平均利潤率和避免破產增加）。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已經非常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稱的“停滯速度”的2.5%，即防止崩潰的最低增長率。

另外，我寫道：“危機始於2018/2019年。在國際上，類似危機的發展可追溯到2017年，順便說一下，貿易戰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主要是由美國政府（“美國第一”）釋放的。2018年，特別是2019年，這種蠢蠢欲動危機的發展蔓延到全球經濟的大部分地區。GDP增速大幅下滑，尤其是中國、日本、法國、德國等國家。例如，從2018年10月到2019年10月，德國汽車產量下降了14%（《金融時報》2019年12月6/7日）。在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德國機械和工廠工程部門的銷售額也下降了4.4%。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整體經濟中，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中間產品及投資量下降了3.6%。（僅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總產量就下降了1.7%。並沒有止步於此：甚至在意大利新冠危機的嚴重程度顯現之前，意大利的採購經理人指數（資料收集工作在2020年2月21日之前完成）下降了0.2，跌至48.7（任何低於50的指數都是危機的明顯跡象）。在此期間，法國採購經理人指數也下跌了1.3點，至49.8點，而南非則更糟，1月至2月，該指數從45.2點跌至44.3點，為連續第七次下跌。



這一總體趨勢在2020年初（甚至在“新冠病毒危機”之前）有增無減。2020年1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出口同比下降2.1%，進口下降1.8%。國際金融研究所（IIF，主要國際銀行的研究機構）預測，2020年上半年美國經濟產出將下降近10%，歐洲下降近15%，日本將下降2.8%。在那之後，經濟將再次回升。然而，該研究所沒有提供任何真正的證據來支持今年下半年的大膽預測。



以利息為主導的預測

2020年3月23日IIF的分析表明，即使在危機明顯爆發後，國際機構依舊落後懵懂，即便是國家統計機構，也仍然描繪了一幅相當樂觀的畫面（至少到3月20日），並預測2020年世界GDP為90.52萬億歐元。今年的增長率為4.5%（2019年世界GDP僅為86.6萬億美元），這種預測完全是虛幻的。

預測不斷被超越。2020年12月12日，菲南茲內（Finanznet）寫道：“慕尼黑大學經濟研究所（IFO）商業景氣指數跌至86.1（2月：96.0），慕尼黑大學經濟研究所（IFO）在其第二份出版物中宣佈。這是自2009年7月以來的最低水準，當時道瓊斯通訊社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測該水準為87.4點。

目前還無法估計下降幅度究竟有多大。現已啟動的大規模援助方案將減輕一些影響，但基本上只是暫時的。人們嚴重懷疑經濟活動是否會從年中開始回升。在國際金融協會（IIF）的計算中，沒有包括更深層次的原因，因為該機構也希望採取信心預測的政策，尤其是為了支持銀行的股價。

作為經濟崩塌導火索的新冠病毒大流行

“宏觀經濟研究公司拉穆里厄（Lamoureux & Co）的總裁伊夫·拉穆里厄（Yves Lamoureux）幾個月前曾警告，不要對股市過於樂觀。自2019年10月以來，這位專家已經開始談論他所謂的“全球金融危機2.0版”。在新冠病毒大恐慌衝擊市場之前，他本人早在12月份就開始出售大部分股票。[...]“我認為，經過10年催化刺激後，我會說：‘這個市場是非常脆弱的。我在尋找會關閉牛市的東西’。市場觀察者拉穆埃克斯說，病毒是刺破泡沫的針。”

現在毫無疑問，新冠病毒大流行駁斥了否認危機發展趨向的人，讓危機公開爆發。今天已經很清楚，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產限制正在使危機嚴重惡化。國際勞工組織預計，新冠病毒危機將導致今年多達2500萬個工作崗位的流失。但即便如此，這也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估計。

與此同時，VIX的發展，即證券交易所的價格波動程度，顯示了投資者的緊張程度。標準普爾500指數（作為VIX正式名稱）下跌在3月初躍升至80以上（峰值82.69），但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股票購買和銷售大幅增長中的緊張情緒，是這種不確定性的持續存在。這與所有陰謀論相矛盾，這些陰謀論僅將這些波動歸因於大型機構投資者為操縱股票進行的針對性干預。還有一個證據：自2月底以來，資產明顯返回到證

券所有者的母國。僅在2020年2月和3月，就通過這種方式從新興市場撤出了550億美元，是2008/09年危機時期歸還美國的兩倍（亞當·圖澤[Adam Tooze]對此也進行了詳細闡述）。

關於危機的原因

資本主義經濟活動處在波濤洶湧中。換言之，遵循了商品、利息和商業信貸需求的週期性變化。有平靜、復興、繁榮、生產過剩、崩潰、衰退、停滯、復蘇等常規階段.....。

原因：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性質，由於缺乏全面的社會規劃——競爭原則本身不允許這樣做——生產能力或多或少是定期的，不再以整個社會的滿足為度。因此，生產過剩危機的本質是資本價值化的危機。對廠房和設備的投資不再有利可圖，必須撤銷——至少部分——這通常會導致結構性失業的急劇上升。

危機有時比1970年代中期之前更為嚴重。背景：自1980年代初以來，資本回報率一直在顯著下降，差不多20年來，只有作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部分，僅能實現小幅上升——主要是以犧牲大多數工薪人口的生活水準為代價。但此後，為了恢復利潤，採取削減工資和預付稅款的補救措施，這已經達到了極限。第一次大衰退出現，隨之出現了所謂的Dot.com泡沫的破滅（從2001年起）；危機在2007年開始，到2008/2009年，危機更為嚴重，導致自上世紀3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

自那時以來，資本增值的條件沒有改善，從幾個關鍵數位中可以明顯看出：在大都市地區，工業利潤率（“資本淨回報率”是所有其他利潤率的基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下降近12%，多年來一直在向10%以下邁進。與此相關的是，

自1970年代末以來，淨資本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一直在下降。本千年開始以來，德國工業固定資產（不包括土地資產）的平均年齡為8至15年，視部門而定；在美國，現在是15到20年，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多。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低投資率也與政府投資大幅度下降有關。

2009年，在2007年開始和2008年公開爆發的危機之後，許多國家（特別是德國）通過政府援助方案緩解了危機的後果。例如，在美國，央行不得不通過巨額注資進行干預，以防止金融體系崩潰。僅由於2008/2009年危機，其金庫的壞賬就超過1.3萬億美元。

然而，國家援助措施的一個作用，也即是危機的例行後果之一——所謂資本調整（資本破壞）——是將債務重新納入國家預算而基本上被消除。然而，自那時以來，這給大多數州的行動力帶來了壓力。

在廣大公眾看來，危機現在被曝光，被視為長期繁榮階段的結束。人們普遍忽視的是，我們在2015/16年已經經歷了衰退，即使在德國沒有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當前危機的特點

最近幾周危機的具體過程表明，危機不會是短暫的，因為有特殊性質，清楚地與幾乎所有其他危機不同。這一次，生產過剩並不是掩蓋一切的原因。相反，我們有一個鉗型發展：

一方面，自2018年以來，過度生產危機已經形成，目前佔這次危機的很大比例，特別是在鋼鐵行業，在汽車行業更是如此。在汽車行業，由於政治要求，技術改造困難使重要銷售市場的

飽和程度更加複雜。(例如,缺乏充電站,最重要的是,有足夠的"清潔"電力,使電力汽車能夠轉換,這被錯誤地宣佈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

另一方面,在可預見的將來,許多地方將缺乏供應,因為重要的供應鏈已經中斷,或將長期由於生產限制而中斷。這種衰退突然到來,同時影響到大多數行業和全世界!美國財政部長擔心失業率將在幾個月內升至20%。摩根士丹利(Stanley Morgan)預測(截至3月23日)美國GDP在4月至6月間將下降14%,高盛(Goldman Sachs)預計,這一降幅為24%。一些經濟學家預計德國將下降5%(儘管這仍是一個樂觀的估計),英國則下降10%。

"世界上從未有過如此同步的經濟停滯"(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2018年首席經濟學家)。聯盟首席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埃爾-埃裡安(Mohamed A. El-Erian)擔心,幾家大型銀行和企業會同時破產(由於過度負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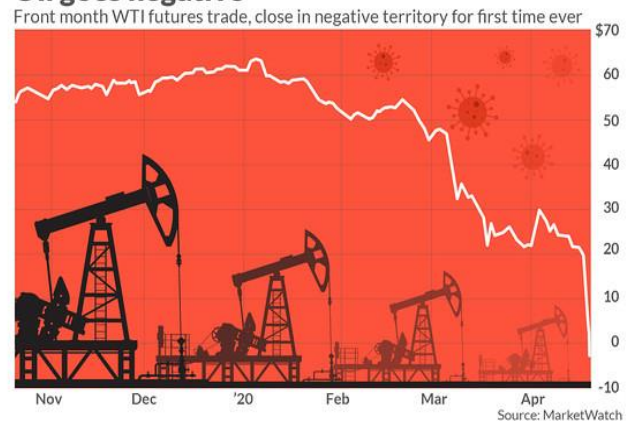
今天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這一次,為彌補在其他地方已經崩潰的銷售市場,中國正在遭遇排斥。正如在2019年秋季第47期《全球經濟批評雜誌》(《Lunapark21》)中,溫弗裡德·沃爾夫(Winfried Wolf)非常合理的解釋那樣,"這一次,中國不會說話"。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大大減弱。此外,汽車行業的問題在過去兩年中大幅增長,現在,最近的2020年2月初以來的新冠危機,導致其生產崩潰。國際投資促進機構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僅為3.5%,鑒於中國工業產能的具體結構(作為全球經濟的工廠),中國至少應增長5%至6%。

中國經濟還有兩個原因面臨風險,一是因為房地產泡沫仍然很大;二是影子銀行規模龐大,2018年,這些銀行資產負債表總額估計為8萬億美元。然而,決定性因素是而且仍然是物質生產的崩潰及其與全球經濟的極端相互依存性。此外:在法國,以及較少程度上的德國,房地產泡沫已經形成,如果經濟衰退持續下去,房地產泡沫可能成為主要推力。

根據WTO的資料,2020年2月中國工業生產下降了30%(是2008/2009年的兩倍)。當今中國,特別是資訊和通信技術領域,沒有大規模生產,國際價值鏈的很大一部分就無法運作(見世界貿易組織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若干年來(甚至在公開貿易戰爭爆發之前),國際價值鏈的重要性一直在下降(世界貿易增長速度低於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但其重要性是突出的,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尤其如此。9.4%的德國進口來自中國。德國極其依賴出口:德國GDP的47%是出口,GDP的41%是進口。

Oil goes negative



油價戰隱含進一步的危險

通常,油價下跌對全球經濟疲軟有積極影響。然而,與此同時,危機發展到現在,油價如此之低,以至於油價在30美元/桶(有時甚至更低)

的水準上下跌，將給一些經濟體帶來極大的痛苦。僅投資已經達到2300億美元的美國頁岩油業，就只能存活幾個月。對墨西哥和巴西等國家來說，情況將更糟，對俄羅斯（其預算基於油價不長期低於35美元），或對沙地阿拉伯來說，情況也很糟糕。這個國家的生產成本最低，但其目標是以高於80美元的價格重建經濟。俄羅斯不想削減生產配額（或者由於敘利亞戰爭的代價而無法這樣做），因此歐佩克和俄羅斯之間沒有達成妥協。

與此同時，由於全球經濟危機，需求下降如此之大，即使幾個月前旨在削減生產的配額也不再管用。現在價格處於谷底，產量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水準。沙地阿拉伯在3月7日宣佈的折扣戰中，向亞洲、歐洲和美國交付的降價幅度為20%，這也促成了這一情況。

另外，同樣具有破壞性的，是其他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礦石和糧食）的發展，這將對非洲和南美洲各國造成特別嚴重的打擊，因為未來幾周的好轉是完全不現實的。除此之外，這些國家的富人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資金轉移出該國。

金融部門和冒險的市盈率

押注股市價值上升的錯覺，促使許多公司在股市上回購自己的股票，這進一步推高了股市價值。例如，在2010年至2019年間，在標準普爾500指數名單上的美國公司回購其股票的花費，不少於5.1萬億美元。僅在銀行業，2017年至2019年間，回購的股票價值總計8633億美元。這些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大股東，尤其是銀行。

利率的下降促使許多公司為這種策略承擔更多的債務。與此同時，投資基金也承擔了債務，以購買更多的（企業）公司。

兩者加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這樣的事實，即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市盈率（P/E ratios）不再反映公司的實際價值。因此，股市出現了泡沫，這種泡沫遲早會破裂。換句話說：這種股票價值的發展不是經濟發展的表現（即利潤的大幅增加），而是短期的敲詐。



債務

截至2019年底，各國和公司的債務總額達到253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322%！舉一個例子：如果在此次危機中，只有2009年一半那麼多公司陷入財務困境，那麼高達19萬億美元的債務就岌岌可危。相比之下，這超過了2019年歐盟GDP總額（包括英國在內的17.17萬億美元）。

鑒於危機的深度，各國（以及央行，只要仍然可以在這裏發揮有效作用），別無選擇，只能遵循馬里奧·德拉吉在2012年7月歐元危機高峰時期的格言（"不惜代價"），即竭盡全力，完全不顧馬斯特里赫特準則（Maastricht guidelines）或債務剎車。例如，美聯儲在一周內四次擴大一攬子措施，最終導致無限制地購買證券（"量化寬鬆"）。）。。

德國政府希望釋放高達5000億的歐元，主要是以信貸為基礎，歐盟也在不斷擴大其援助計劃。意大利：3000億歐元，英國3000億英鎊等。歐洲央行希望以7500億歐元購買債券，可能還會發行更多債券。問題是：這些措施能取得多大成效？

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管理政策的資源會很快耗盡（到2020年）。因為我們不僅要應對供應鏈或銷售機會的中斷，甚至不清楚這些障礙和限制會持續多久。在目前的危機中，過渡性貸款只能取得有限的結果。至少有三個嚴重因素彙集在一起，其程度遠遠超出了2008/09年危機的情況：

首先，政府想花他們沒有的巨額資金。例如，美國政府預計支出將高達2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國債擴張，增加了2008/09年危機中仍在積累的債務，使國家債務增加了一倍。特朗普將公司稅（2018年）從35%下調至21%，這進一步縮小了迴旋餘地。

其他國家的情況只是程度不同。世界上沒有哪個地區能夠從泥潭中拉出大車，作為額外的供應商或銷售市場。因此，這般抽水只會將問題轉移到未來，這大大增加了在不遠的將來發生更大崩盤的風險。此外，根據危機的發展情況，這種大規模的貨幣貶值，增加了受影響貨幣的信用減弱的風險，這可能導致銀行出現擠兌。反過來，這立即意味著支付流的崩潰。

第二：今天，全球私人和部分國有化銀行仍有數千億美元的壞賬。在標題為“新冠病毒成為銀行業的壓力測試：是否有新的金融危機的威脅？”的網站finanzen.net 3月24日的文章中，寫道：“在股市上，冠狀病毒的影響已經波及到銀行：自2月中旬以來，歐洲許多主要銀行

的股價大幅下跌，一些股票甚至下跌了一半。斯托克歐洲600銀行，包括歐洲最大的金融機構，於3月18日收於83點，為1988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即使在2009年3月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歐洲銀行的指數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大幅下跌。僅2月中旬以來，該行業的股市晴雨錶已經下跌了40%以上。根據美國銀行3月底的一項研究，‘現在美國市場的崩潰，比1929年的崩盤還要嚴重’。我們不要忘記：在意大利，Covid-19病毒特別嚴重，經濟癱瘓數月，GDP急劇下降，銀行業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更不用說公共債務水準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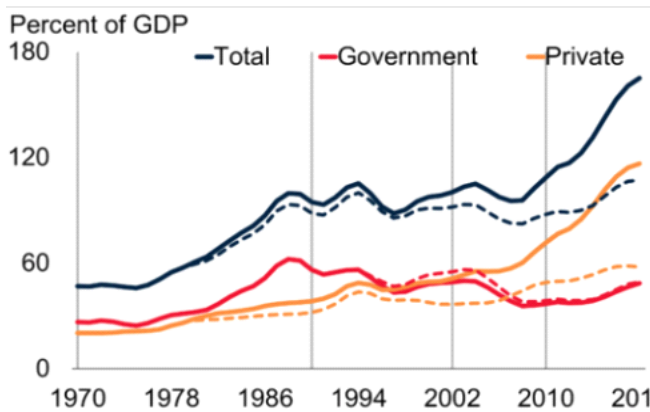
第三，製造業公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貿易和物流公司）現在也負債累累，尤其是因為近年來獲得的貸款非常便宜。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最新資料，自2008年以來，公司債券債務翻了一番，到2019年底達到13.5萬億美元。[...]當時，信用評級被下調的公司將幾乎沒有任何替代融資來源，將不得不接受高得多的信貸成本。這兩種影響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債券違約的可能性，並可能導致危險的多米諾骨牌效應。（2020年2月19日）市場信心的喪失，也是公司債務大幅增加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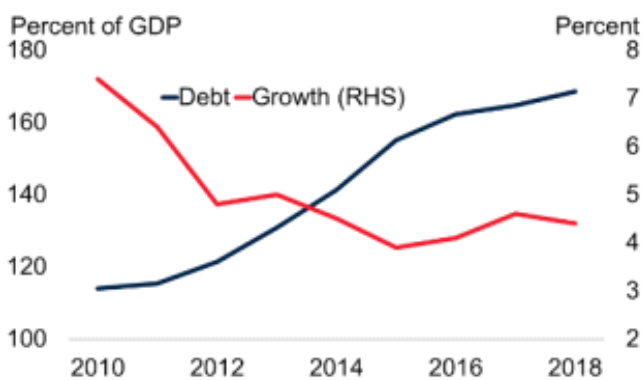
新興市場的債務

特別是新興市場的債務，在新冠危機之前已經是一顆定時炸彈。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公開爆發（即自2020年2月底以來），這有可能成為大規模“崩潰”的最大危險來源，即自20世紀30年代初（包括2008/09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衰退。

正如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指出的，"自2010年以來，大部分債務增加發生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EMDEs），其債務佔GDP的比例增加了54個百分點，2018年達到創紀錄的GDP的170%左右。"這一增長基礎廣泛，對大約80%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產生了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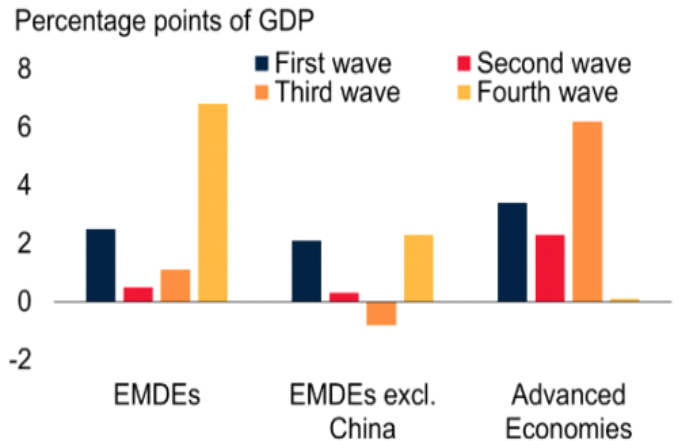
圖表顯示了（來自「債務和金融危機：歷史會重演嗎？」）1970年以來，新興市場債務的發展情況，虛線不包括中國。



同樣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指出："儘管債務急劇上升，但這些經濟體的增長一再令人失望，在脆弱的全球經濟中，面臨著黯淡的增長前景。除了債務的快速積累外，還積累了其他漏洞，如財政經常帳戶赤字增加以及較危險的債務構成。"

藍線顯示債務增加，紅線顯示經濟增長下滑。

在每個"債務波"的末尾，圖表如下：



因此，債務的增加從未像第四波結束時那樣大。此外，在"逃往避風港"（因此，也是逃向美元）時期，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債務增長更大。因此，債務水準（甚至在新危機爆發之前）大大高於2008年。

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希望提供1萬億美元用於支援措施（貸款），但其中只有500億美元將用於新興市場，僅有100億美元用於最貧窮的國家。與此同時，資本正在從這些國家流出。

由於這一發展，勞工組織（ILO，日內瓦）現在（截至2020年3月18日）預計新增失業人數為530萬至2 470萬（在2019年正式登記為失業的1.88億人中）。但是，這些計算基於3月16日的資料庫。由於危機的發展比大多數病毒學家在3月中旬以前所認為的要嚴重得多，因此經濟衰退（不僅在意大利）也嚴重得多，失業人數也應大大增加。



威脅貨幣體系的過渡？

在金融市場層面，極為多樣化的衍生品的巨大擴張也正在造成損失，即使是不可靠證券，也進行一攬子的證券化而擴張，並非所有證券都能得到充分對沖。如今，私人股本完全令人困惑的增長正日益成為信用違約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s）的一個問題。

今年，超過兩萬億美元的企業貸款必須重新談判。在這種情況下，誰還能輕易發放新貸款，即便以近年的低利率放貸？預計會有高風險的保費。不止於此：由於銀行、保險公司以及現在許多大公司（見上文）的穩定性不斷下降，危機從信貸系統轉向貨幣體系的風險在未來幾周內將顯著增加。

因此，如果企業停止相互借貸，只出售商品收現款，經濟衰退將加深。鑒於這種擔心的程度，政府的過渡性貸款無法抵消這一點。資本主義經濟過去出現的所有矛盾，現在都以特別戲劇性的速度出現，以至於要打破供應鏈。存在重大破產的威脅，出現世界90年未有過的連鎖反應。

政府到底能採取行動多久？與中央銀行一起，仍然可以使用巨大的財政資源（各種救援計劃）。然而，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存在限制，例如，當美聯儲在恐慌模式下將利率降至零時，並且像歐洲央行一樣，承諾大規模購買債券。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措施幾乎沒有鎮定效果；股價仍然波動不定。中央銀行的權力正日益受到商業界的

質疑，質疑者集中在金融部門。在意大利等一些國家，財政政策也達到了極限。由於公共部門貸款水準已經很高，而且現在增長迅速，因此已不能排除國家破產。下一次歐元危機的可能性更大，隨著預期的危機急劇惡化，甚至可能導致歐元的終結。

政治後果

廢除非法債務委員會（CADTM）董事埃里克·圖桑主張整個金融部門的全面社會化，並得出結論：

“這項措施必須是一項更大範圍的緊急、徹底和影響深遠的計劃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暫停並最終取消公共和私人非法債務，關閉證券交易所，建立一個真實的國家衛生系統，無償徵用製藥公司和私營實驗室、能源部門公司（規劃和管理生態危機），並將其置於公民控制之下，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

應對冠狀病毒的流行應成為一個機會，鼓勵在生活方式、財產結構、激發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社會關係的價值觀方面，進行真正深刻的革命。只有當制度的受害者自我動員，自我組織和將那1%的人及其走狗從權力位置驅逐出去，建立真正民主的權力結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一個生態的、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的和自我管理的革命是必要的。

探索經濟學小組翻譯自德文，載於‘關於COVID-19大流行的經濟後果與全球化結構危機滙編’。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20年4月6日，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er_article&id_article=6512

編輯按：今年，我們紀念第四國際兩位領袖人物的逝世。萊昂-托洛茨基，俄國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領導人，第四國際奠基者，被斯大林主義者特務暗殺，於1940年8月21日去世。丹尼爾·本賽德，馬克思主義活動家和哲學家，從1968年法國“五月運動”中崛起，終其一生為第四國際與法國支部領袖，惜於2010年匆匆離世。在這個悲痛的周年紀念日，我們發表丹尼爾·本賽德寫於2000年的一篇悼念托洛茨基的文章。

托洛茨基：世紀明燈

丹尼爾·本賽德



為什麼要策動這次暗殺？撇開斯大林的反常個性不談，我們要從托洛茨基最後的鬥爭，也就是整個墨西哥時期說起，在那個時期，他主要在希望崩潰的階段發動了三次偉大的鬥爭。

首先，他要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在1917年10月的初始階段與斯大林熱月政變之間劃清界線。為此，他一旦抵達墨西哥後（1937年1月），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期間，專門組織了由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主持的國際調查委員會。整整五百頁檔案，拆解了偽造與政治吞併的機制。第二，理解新戰爭的步驟，在這個階段，沙文主義將加劇和激化階級問題。最後，第三場鬥爭與之前鬥爭相聯繫，是為了建立新國際——1938年宣佈成立，但至少在五年前，從希特勒在德國取得勝利後就已經策劃了——他認為新國際不是

純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聚會，而是工具，直面當下的任務。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不可替代”。

失敗時代

托洛茨基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事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發生的事件相提並論，其預言是錯誤的。錯誤在於工人運動所處的情況非常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積累了許多因素；但關鍵的無疑是1930年代蘇聯的官僚反革命，污染了整個工人運動及其最革命的成份。當時存在著誤解，許多法國共產黨人面對德蘇協約感到疑惑就是最佳例子。但也有重大失敗，如納粹主義在德國和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連連取勝，西班牙內戰失敗，第二次中國革命被粉碎。社會、道德甚至身體層面的挫敗交互積累，我們難以想像。但你永遠不能認為一切都已事先決定。

托洛茨基的一個重大錯誤是想像戰爭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斯大林主義的垮臺，正如1870年的法德戰爭意味著法國波拿巴主義政權的死刑一樣。我們身處1945年，正當斯大林主義全勝時代，但同時顯現其矛盾。在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一書中，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內容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切。通過鬥爭，我們眼

見社會覺醒，甚至有些方面擺脫官僚的控制。我們能夠設想激活十月革命的活力。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20年僅僅短暫間隔。但是，格羅斯曼在書中所說的，接下來是不可阻擋的。斯大林獲勝而被拯救了！我們不要求勝利者對自己負責。這就是這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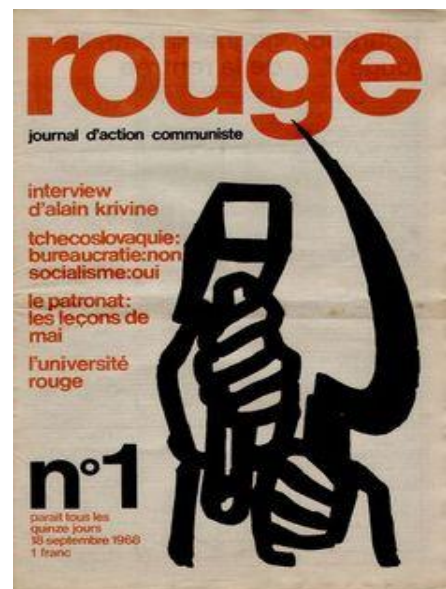
理論上的影響是重要的。在對官僚極權主義的批判中，如果托洛茨基非常瞭解警察暴力的作用，那麼他就低估了民眾共識，連繫著斯大林主義政權所產生的甚至是以高昂的代價產生的如法老般的動力。這是被忽視的問題，值得我們探究。

然而，在戰後，各方都有具體的責任。在世界劃分的框架內——著名的斯大林-邱吉爾會議，他們用藍筆劃分了歐洲——出現了重要的社會或革命前的浪潮，如在法國，但在意大利和希臘更是如此。而在這裏，我們可以坦率地說到叛國，說到社會運動從屬於機制的利益。這並不自動意味著革命的勝利，而是意味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動力與政治文化，截然不同。這就有了其他的可能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回想起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莫里斯-托雷茲那句著名的“你必須知道如何結束罷工”，或者意大利共產黨攻擊托利亞蒂時的態度。但最糟糕和最悲慘莫過於西班牙革命失敗，抵抗運動與希臘革命的繳械投降。然後，斯大林對巴爾幹聯邦專案的投票，仍然是巴爾幹地區民族問題唯一政治解決方案。



必要的與可能的

總而言之，托洛茨基的悲劇性命運說明了必要與可能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應對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變革與眼前的可能性之間。我們在閱讀馬克思的書信時已經可以發現這一點。托洛茨基在理論和策略上的貢獻相當鉅大，特別是早在1905年就從俄國開始，對社會的綜合發展和不平衡發展的分析，或者對當前帝國主義模式的認識。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反革命這一當時聞所未聞、難以理解的現象的分析，儘管存在不足，卻是不可替代的。從這一點來看，托洛茨基乃指路明燈。這並不意味奉他為虔誠或獨尊的指標。恰恰相反，我們的任務乃傳遞工人運動及其交織的戰略辯論的多重記憶。但在此景況與險要的段落中，托洛茨基給予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原文為法文，發表於革命共產主義同盟週報《紅色》(Rouge)，以紀念托洛茨基逝世60周年。本文譯自《國際觀點》英譯版，<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780>)

為第四國際而鬥爭*——一致所有革命無產階級組織和集團的一封公開信 (1935)

列·托洛茨基



希特勒上臺沒有受到兩個“最強大的”工人政黨的絲毫反抗，它們中的一個還依靠的是蘇聯，徹底地暴露了第二和第三國際的內部腐朽。1933年8月，四個組織[共產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荷蘭革命社會黨、荷蘭獨立社會黨首次在綱領性的文件中闡述了新的歷史任務：創建第四國際。那天以後發生的事件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是唯一的道路。

粉碎奧地利無產階級表明，當黨被驅入困境，只在最後關頭號召被機會主義瓦解和搞得厭倦的群眾起義，對勝利來說是不夠的。勝利應該在工人運動的所有領域中系統地準備的。

在西班牙無產階級的粉碎中，也不容置疑地得出這個教訓。在任何情況下，尤其是在革命中，為與資產階級結盟而背對勞動者，是絕對不允許的。不能指望和要求被欺騙和失望的群眾在聽到他們對之已經失去信任的黨的過遲的召喚就拿起武器。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靠破產的領導的命令隨心所欲地搞的。應該用不斷的和不妥協的階級鬥爭來準備無產階級革命，這一鬥爭為領導贏得了黨的堅不可摧的信任，把先鋒隊與整個階級團結起來，把無產階級變成城鄉所有被剝削者的領袖。

在改良主義的主要支部、徹底腐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可恥的滅亡後，第二國際的“左”翼在奧地利和西班牙也遭受失敗。但這些可怕的教訓沒有留下痕跡：改良主義、黨和工會的領導幹部退化到了骨髓，他們與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護國主義觀點緊密聯繫在一起，完全不能回到階級鬥爭的道路上。

第二國際的各黨平靜地接受了下面的事實，比利時黨主席一聽到金融資本的信號，就為在勞動群眾的脊梁上拯救銀行與天主教和自由派的實業家聯合起來。自吹自擂的馬克思的批評者和“計劃”的創造者德·曼迫隨王德威爾得；左翼中派分子斯巴克¹沒有放過出賣社會主義反對派來換取部長桂冠的機會。

* 譯自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No.44, стр.1-6。

此信載 1935 年 8 月的《新國際》。1935 年 5 月底，托洛茨基獲通知，挪威政府決定給他簽證，他離開多門前往巴黎的那天，寫完了這封信，是在以皮埃爾·賴伐爾為首的新內閣組建的三天後。——英譯者注

¹ 斯巴克（Paul Henri Charles Spaak, 1899-1972）比利時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比利時社會黨黨領袖（1944 起）。歐盟創始人之一。曾任比利時首相（1938-1939、1946、1947-1949）、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1957-1961）。——譯注

法國社會黨不顧教訓和警告，繼續徒勞地抓住“共和的”資產階級，更大地寄希望於激進派的友誼，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雖然資本主義已經腐朽，在荷蘭、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在瑞士，在所有國家中，在世界的各地，社會民主黨仍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暴露出完全不能為保衛自己免遭法西斯主義的侵害而動員群眾。

如果工黨的選舉成績導致它上臺，結果不是對英國進行和平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團結，即內戰時代，在它的面前，工黨的領導必然會暴露出自己是完全不稱職的。議會和工會克汀病患者不得不相信，法西斯主義在英國的威脅和在大陸一樣現實。

在美國危機迅猛發展的基礎上，在美國的此起彼伏的罷工和創建工人階級的組織利用羅斯福蠱惑的“計劃”給予的機會，在自己的工人運動的道路上遇到了極其保守的和資產階級的力量。斯大林的黨被李維諾夫的莊重聲明束縛，後者為了報答美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承認，公然與美國共產黨員斷絕關係。被十年的無原則地玩弄權術和對各黨的取消主義的經驗，它們無論是在人員構成，還是在綱領上，都與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工農黨），斯大林的黨根據來自莫斯科的命令，局限于扮演激進知識份子運動的角色，後者在美國的所作所為只是作為斯大林外交的幫手。但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把廣泛的美國工人階層從外省的冬眠中喚醒，逐漸驅散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無產階級推向大規模的階級活動的方向（托萊多、明尼阿波利斯、聖弗蘭西斯科的罷工），並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創造了贏得對美國工人階級發展和組織的廣泛和深刻影響的機會。落到第四國際和它的美國支部——不僅是南北美兩個大陸範圍內，而是在世界舞臺上——身上的歷史角色，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然而第三國際只是靠它在其存在的頭五年贏得的影響和權威的殘餘苟延殘喘。在奧地利和西班牙，共產國際儘管有有利的條件，卻不僅不能創造有些影響的組織，還不斷地在工人的眼前敗壞革命思想的本身。薩爾的全民投票表明，德國無產階級不僅對社會民主黨，而且對可恥地向希特勒投降的共產黨喪失了全部信任。在英國、比利時、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南北美和東方，共產國際的各支部被十二年的致命政策拖累，不能擺脫無足輕重的狀態。

誠然，在德國災難後，共產國際用不惜一切地建立投降的統一戰線政策取代了冒險的“第三時期”政策。但是，新的轉折在那裡獲得了極大發展的法國的經驗表明，共產國際儘管矛盾重重和左右搖擺，居然仍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制動器。否定了在法西斯直接危險面前建立工人民兵，用局部要求的綱領取代奪取政權的鬥爭，共產國際成了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最糟糕的幻想的散播者，事實上支援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反對左翼，敗壞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士氣，為法西斯政變清理道路。

最後，共產國際的創始人——蘇聯共產黨，在近幾年中，被不受監督的官僚徹底粉碎，它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斯大林的保守的個人集權。借助中傷、偽造、大雜燴和血腥鎮壓，當權集團力求把所有馬克思主義思維活動扼殺在萌芽中。列寧主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蘇聯那樣遭受如此野蠻殘酷的迫害。

共產國際最近的機會主義偏離，與蘇聯轉向國際聯盟和與法國帝國主義的軍事聯盟的外交政策的轉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蘇聯當權的官僚最終得出結論，共產國際已經無力在反對戰爭危險上給它提供任何幫助，同時還妨礙蘇聯的外交工作。共產國際對蘇聯上層的屈辱的奴隸式的依附，最公然地表現在它對斯大林不久前的聲明的態度上，該聲明贊成保衛法國帝

國主義。

通過帝國主義的外交部長，共產國際的領袖命令法國共產黨立即簽署與法國資產階級的護國主義的停戰協定。這樣，第三國際，它的代表大會已經有7年沒有召開了，正式從國際主義立場轉到最庸俗、奴顏婢膝的社會護國主義上。無論是打算還是不打算把第七次代表大會一直拖下去，第三國際都是不會復蘇的。斯大林對賴伐爾的聲明，就是它的死亡證書。

* * *



同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力量在繼續著自己的地獄般的工作。世界經濟的瓦解、幾千萬人的失業、農民的破產莊嚴地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提上日程。被激怒、喚醒的勞動者尋找出路。第二、第三國際的衰竭、瓦解、腐朽讓無產階級失去革命領導，把小資產階級群眾推上絕望的道路。破產的領袖們試圖把法西斯的勝利轉嫁到無產階級的“消極性”上：這樣，政治叛變得到誹謗的補充。

在無出路的矛盾的鉗制中掙扎的資本主義，準備著對各國人民的新的屠殺。部長們和獨裁者們在公開討論戰爭是在一年或三年後爆發。

所有政府都在充分準備最有殺傷力的武器，從而使遠比1914-1918年戰爭可怕的爆炸從四面八方迫近。

所謂的工人政黨和工會的領袖們都在頌揚和平的好處，空談“裁軍”，勸說自己的政府彼此妥協，用國際聯盟的工作讓群眾產生希望，同時發誓自己忠於“國防”事業，即保衛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它的不可避免的戰爭。

蘇聯外交在“統一戰線”和甚至是“組織統一”的掩蓋下，背著自覺的工人籌備在似乎和蘇聯是軍事聯盟的國家中讓兩個國際的支部與資產階級的全國統一。這樣，新戰爭的爆發將導致新的背叛，它將使1914年8月4日²黯然失色。

* * *

蘇聯官僚對世界革命的背叛把全球無產階級遠遠地拋向後面。全球革命先鋒隊面臨極其巨大的困難。但它現在的處境仍比上一次戰爭前夕要有利得多。那時的資本主義顯得十分強大，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國際的護國主義的墮落甚至對列寧來說也是完全意外的。各處的革命分子都被搞得措手不及。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人數極少，其中多數還猶豫不決——只是在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多才召開。革命幹部的形成進行得很慢。甚至是多數“齊美爾瓦爾德分子”都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只是在戰爭的第40個月時，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改變了事態，給予第三國際的形成以強有力的推動。

現在，資本主義的內在的軟弱和腐朽是如此明顯，甚至成為法西斯蠱惑的主要話題。在美國的巨大的危機中，在同樣巨大的失業中，在羅斯福的經濟冒險中，在罷工鬥爭的規模上，在工人組織的內部騷動中，首次積澱了北美革命運動的強勁發展的條件。例如，第一次勝利的無產

² 指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914年8月4日在國會投

票贊成戰爭預算。——譯注

階級革命活在群眾的記憶中。近20年的偉大事件的經驗銘記在最優秀的戰士的意識中。在所有國家裡都存在真正革命的組織和哪怕是小組，它們在思想上，尤其是在組織上彼此聯繫起來。現在，與1915年秋就倡議籌備第三國際的“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相比，它們已經是更加令人信服的、志同道合的和經受鍛煉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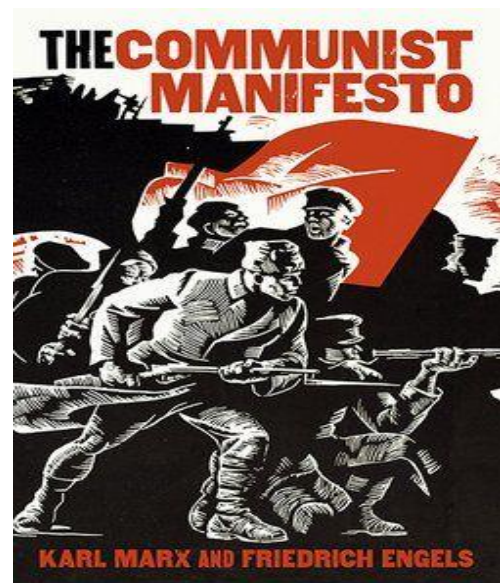
在改良主義的政黨和工會中，反對派集團正在產生和得到鞏固。它們中的許多有獨立組織的性質。共產國際各支部中的反對派由於苦役式的制度，它具有更加無聲和隱蔽的性質，但它也在其中發展。甚至在蘇聯，對新的清洗和鎮壓的需要，證明了官僚未能成功地根除它所仇恨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精神。

反對派的情緒和思潮現在主要具有的是憤怒的中派主義性質，即處於社會護國主義和革命之間的性質。在傳統群眾組織衰落和瓦解的條件下，中派主義在許多情況下代表的是不可避免的過渡階段，甚至對進步的工人集團來說，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善於找到進入所有這類思潮的臺階，以使用自己的榜樣和自己的宣傳來加速它們轉向革命道路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的成功的條件，是不妥協地批判中派主義的領導，揭露復蘇第二國際的企圖，不倦地解釋，我們時代的革命任務早就註定了不徹底和無形的聯合的可恥失敗。

不管它們的綱領和策略的所有工人組織的“統一”的口號，在當前由中派主義分子們起勁地宣傳，被最有遠見的改良主義者們所利用，後者完全有理由害怕被拋出船舷。中派主義分子往往用兩個舊國際聯合的替換新國際的思想。事實上，與改良主義者、社會民主黨或斯大林派的統一，最終意味著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與世界無產階級，然後是本國無產階級的破裂，尤其是在戰爭的情況下。真正的國際和它的各民族支部的統一，只有在革命

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得到保證，這個基礎又只能通過與社會護國主義的決裂才能建立。對無產階級統一的原則條件和保障閉口不談，意味著欺騙工人，並為新的災難做準備。

兩個舊國際屈辱的和沒希望的處境由下面的情況得到了界定：其中一個主席成了國王的馴服的大臣，另一個的實際主人利用世界無產階級組織，把它當成是外交勾當中的零用錢。無論兩個同樣被官僚所腐化的國際的聯合手腕如何，它們都不能創造無產階級的統一，不能開闢出路。中派主義者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通過局部修補來拯救不可避免的滅亡，他們的徒勞是早就註定了的。新時代需要新國際。在這條道路上成功的首要條件，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馬克思和列寧的學生，在共同綱領和共同旗幟下的民族和國際的團結。



試圖為所有國家確立共同的路線是致命的。取決於各民族的條件、工人組織的瓦解程度，最後是當前自己力量的狀態，馬克思主義者（革命社會黨人、國際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能夠時而以獨立組織，時而以某個舊黨或工會中的派別的形式出現。這個派別工作最終只是在創建第四國際的新黨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這些黨的創建或是作為舊組織的革命分子重組的結果，或是通過創建獨立的組織。但它們無論是在什麼舞臺上，用什麼方法行動，它們都將以不可分割的革命原則和鮮明的革命口號的名義出現。它們不與工人階級捉迷藏，不隱瞞自己的目的，不用外交和耍手腕來取代原則鬥爭。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都公然地說出事物的真相。

* * *



戰爭危險關乎人民群眾的生死，是對工人階級的所有集團和流派的巨大考驗。“為和平而鬥爭”、“反戰鬥爭”、“用戰爭反對戰爭”和類似的口號，如果不伴隨著宣傳並使用鬥爭的革命方法的，就都是空洞和欺騙的話語。推翻資產階級是結束戰爭的唯一方法。武裝起義是推翻資產階級的唯一方法。

應該提出革命地消滅民族國家的口號來對抗“國防”的謊言。應該用作為世界聯邦第一階段的歐洲社會主義聯邦來對抗資本主義的歐洲瘋人院。

馬克思主義者斷然否定“裁軍”、“仲裁法庭”、“各國人民和解”（即各資本主義政府）等和平主義的口號，認為它們是愚弄人民群眾的大麻。工人組織與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交易（阿姆斯特丹-普萊耶爾委員會和類似的機構）為帝國主義提供最好的效勞，把工人階級的注意力從它的嚴酷鬥爭的現實引向無力的遊行。

反戰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能是某些專門的“委員會”的事。反戰是籌備革命，即工人政黨和國際的事。馬克思主義者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提出這個宏偉任務，不加任何掩飾。他們用爭取軍隊和武裝工人的口號來對抗削弱力量的“裁軍”口號。這裏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和中派主義之間最重要的分界線。誰不敢大聲說出革命任務，他就永遠沒有解決它們的勇氣。

* * *

在公佈第四國際第一份綱領後的一年半內，為它的原則和思想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成長出許多革命的各國支部和集團，其中一些擴展了自己的隊伍和影響，另一些在純潔性和團結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接近的組織聯合起來（荷蘭和美國），制定了一系列綱領和策略文件。如果整個這項工作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下在世界範圍內協調並聯手進行，它無疑會成功得多。日益迫近的戰爭危險不允許再把任務拖延一天了。

應該在新基礎上建設新黨和新國際：解決所有其他問題的鑰匙就是這樣。新的革命建設以什麼速度和在什麼樣的期限內完成，當然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總體進程，無產階級今後的勝利和失敗。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宿命論者。他們不會把歷史過程賦予他們的任務轉交給“歷史過程”。自覺的少數的首創精神，科學的綱領，為明確形成的目的進行勇敢和不倦的鼓動，無情地批判所有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

勝利的重要因素就是這樣。沒有團結的、久經考驗的黨，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

條件是困難的，障礙是巨大的，但對於悲觀主義來說，精神低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雖然無產階級經受了種種失敗，階級敵人的處境仍是毫無希望的。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拯救人類。

幾個國際的交替是有其內在的、符合無產階級的歷史上升的邏輯的。第一國際宣佈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綱領，但因沒有群眾基礎而解體。第二國際從黑暗中站起來，教育和團結了數百萬工人，但在關鍵時刻被因資本主義繁榮而腐化的議會和工會官僚所出賣。第三國際初次展示了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榜樣，但在孤立的蘇維埃國家的官僚和西方改良主義的官僚之間被碾碎。今天，在資本主義最終衰落的條件下，第四國際依靠自己的先驅者的肩膀，他們的勝利和失敗的豐富經驗，為勝利地向世界資本主義的堡壘進軍而團結東西方的勞動者。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荷蘭革命社會黨：P.J.施密特、H.斯尼夫利特

美國工人黨：A.J.穆斯特、詹姆斯·P.坎農

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國際書記處：克魯克斯、杜布瓦、瑪律金

我們把關於第四國際基本原則的《四方聲明》附在此信後面。這份聲明中沒有一行是過時的。這封信只是在近一年半的經驗的燭照下對《四方聲明》的解釋。

我們呼籲所有政黨、組織、新老政黨中和工會內部的派別、所有革命工人聯合會和集團在基本原則上、在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籌備

和建立第四國際——上與我們團結一致，把你們在這封公開信下的簽名、你們的建議和你們的批評寄給我們。個別至今與我們的工作沒有聯繫的同志，如果真的打算今後加入共同的隊伍，就應該與我們建立聯繫。

在公開信上簽名的創始組織決定建立站在第四國際立場上的各政黨、集團之間的聯絡委員會。委託臨時委員會出版國際通報。

今後，委員會應該保證正確地制定第四國際的基本綱領和策略的文件。

有關籌備國際代表會議的問題將根據得到的答覆和籌備工作的總體進程來解決。



原文譯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4, стр.1-6, 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譯。

出路（1934）*

列·托洛茨基



我們在過去的一篇文章中已經說過，法國社會黨的發展方向與國家發展方向相反：由於議會制被波拿巴主義所取代，後者代表的是在通往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不穩定的階段，相反，社會黨是朝著與法西斯主義致命衝突前進。不過，是否可以賦予這個現在對法國政治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情況以絕對的、因而也是國際意義的性質呢？

不，真理永遠是具體的。當我們說在當前社會危機的條件下，社會黨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發展道路背道而馳時，我們說的只是發展的總體趨勢，而不是同一的機械過程。對我們來說，

政治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趨勢變成現實的程度。可以提出相反的原理，希望它不會在我們之中引起任何異議，即在我們時代，無產階級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黨是否能在發展進程給予它的短暫瞬間內，堅決地與資產階級國家決裂，並為反法西斯的決死戰鬥調整自己，為此做好準備。無產階級的命運可以取決於社會黨命運的可能性的本身，是作為國際無產階級領導黨的共產國際的垮臺和階級鬥爭異乎尋常的加劇的結果。

被中派主義推到一邊的改良主義傾向，像中派主義激進化的傾向一樣，由於符合資本主義和民主國家的整體危機，是不能不具有國際性的。但對於從在發展的現階段，在特定國家的社會黨中，這個傾向會如何折射這個問題中得出實際的，首先是組織的結論，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我們制定的總的發展路線，只能指導我們的分析，但絕不預先得出它的結論。

在前法西斯德國，資產階級國家和改良主義的破裂的臨近表現為社會民主黨內的左翼的形成。但在群眾完全迷失方向的情況下，官僚機關足夠強大，能夠提前砍掉還很軟弱的左翼（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讓黨停留在保守和觀望政策的軌道上。同時，德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

* 譯自網上下載的 *Путь выхода*。

此文載 1934 年 9 月的 *La Verite* 《真理報》，署名 CC，1934 年 9-10 月的《新國際》，署名 V。此文為發表而寫，但直到 8 月 29 日，同盟全國代表會議同意加入法國社會黨後，才在 *La Verite* 發表。在刊登此文的那期 *La Verite* 上，把它說成是法國社會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集團的文件。除解釋贊成加入的理由外，托洛茨基的文章還警告說，在法國與社會黨得出的結論，不能機械地運用到其他國家，每個國家的形勢都要具體考察。同時，他暗指加入策略也不必僅限於法國。同年晚些時候，他贊成加入比利時、西班牙社會黨，他同意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與美國工人黨合併為工人黨的決議，後者於 1934 年 12 月成立。一年多以後，於 1936 年初，美國工人黨決定加入美國社會黨。——英譯者注

¹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咒語和蠱惑下，用阿姆斯特丹的遊行²來取代對群眾的革命動員，而在現實力量對比中，在沒有統一戰線政策的情況下，這種動員是無法實現的。結果是，強大的德國無產階級表明它無力給予法西斯政變以最輕微的抵抗。斯大林分子宣稱：這全是社會民主黨的錯！但他們以此承認，他們想成為德國無產階級領袖的野心沒有任何意義，只不過是空話吹牛而已。這個重大的政治教訓對我們表明，首先，甚至是在一個國家中有重大影響——在絕對和相對意義上——的共產黨，也不會在決定性的時刻有所作為，由於社會民主黨保持了集中它的保守抵抗前者的力量的可能性。讓我們把這點牢牢地銘刻在頭腦中。

這個基本歷史趨勢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法國折射出來。在特殊的民族條件和國際教訓的影響下，法國社會黨的內部危機經歷了遠比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相應時期更加深刻的演變。社會黨官僚不得不被迫對右進行打擊。不是開除的軟弱的左翼，像在德國的情況下那樣，我們見證了與更堅定的右翼（作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即新社會黨的決裂。這兩個分裂以其對稱性最鮮明地突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之間在演變中存在的重大區別，雖然這兩個黨有

共同的歷史趨勢：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危機，改良主義的垮臺和資產階級國家與社會民主的決裂。

從上面指出的角度，必須對正在經歷危機不同階段的所有國家的社會黨的內部情況做出評價。但這個任務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讓我們只提一下比利時，那裏的社會黨已經被反動、腐敗的官僚——議會、市政、工會、合作社和銀行官僚——徹底束縛，現在它已陷入反對其左翼的鬥爭中，力求無論如何都別落後於自己的德國榜樣（威爾斯-塞弗林³及其一夥）。很清楚，是不能對法國和比利時得出同樣的實際結論的。

認為一方面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比利時社會黨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國社會黨的政策，代表的永遠是兩個彼此水火不相容的類型，是錯誤的。在現實中，這兩個類型能夠並且會不止一次地彼此轉換。可以充滿信心地說，如果當時德國共產黨推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的話，它會強有力地推動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激進化，德國的整個社會發展就會獲得革命性。另一方面，得到斯大林分子積極支持的法國社會黨的官僚會孤立左翼，讓黨朝退化的方向演變，這也是不能排除的；不難預見它的結果：無產階級的沮喪和法西斯的勝利。對比利時來說，社會黨實際上是

¹ “第三時期”理論所謂的三個時期，是把 1917 年以後的世界革命形勢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 1917 至 1923 年，是革命的高潮時期；第二時期從 1924 至 1927 年，是資本主義穩定時期；第三時期從 1928 年開始，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全面勝利的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即將總爆發，它已無力對付下一次經濟危機，從現在起，世界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此前一直處於守勢的共產國際將轉入全面反攻，階級鬥爭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義。斯大林炮製這個荒誕的理論，是為了彌補此前他與布哈林一起在國內外推行的右傾政策造成的災難——1927 年秋的糧食徵購危機和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並標誌著他從極右轉向極左。然而經驗主義的搖擺帶來的都是災難，在第三時期理論指導下的德共在面對法西斯危機時，不僅不與社會民主黨結成統一戰線，反而集中火力打擊“社會法西

斯”，使希特勒坐收漁人之利，於 1933 年上臺，也使人類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譯注

² “阿姆斯特丹的遊行”指的是斯大林主義組織（世界反戰委員會、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等）的各種“戰線”的活動往往是在阿姆斯特丹發起或指揮的。它的兩次主要的代表會議一次於 1932 年 8 月在阿姆斯特丹召開，另一次於 1933 年 6 月在巴黎召開。它的典型的分支機構是美國反戰反法西斯同盟，在人民陣線時期，它更名為爭取和平與民主同盟。——英譯者注

³ 威爾斯（Otto Wels，1873-1939）和塞弗林（Carl Severing，1875-1952）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作為柏林的軍事指揮員，威爾斯在 1919 年鎮壓了斯巴達克起義，後來他領導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塞弗林曾任普魯士內務部長，於 1932 年 7 月被巴本免職。——英譯者注

無產階級的唯一政黨，沒有在社會黨的队伍中決定性的力量和傾向的重組，勝利的反法西斯鬥爭是根本不能想像的。但不能事先預見所有的發展階段和形式。必須用手觸摸勞工運動的脈搏，每次都得出必要的結論。

上面所說的一切，對理解社會黨內部的演變對無產階級命運——至少在歐洲，對最近的歷史時期來說——的極端重要性來說，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們回憶一下，1925年，共產國際在一份專門的宣言中宣稱，法國社會黨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明白，在不肖之徒⁴的統治下的幾年中，無產階級，尤其是它的先鋒隊出現了多大的倒退！

對德國，共產國際已經承認——誠然是在事後，以負面的形式——它完全沒有能力進行反法西斯鬥爭，如果社會民主黨不加入鬥爭的話。對法國，共產國際被迫做同樣的聲明，但在事先，用的是積極的形式。對共產國際越糟糕，對革命事業就越好！

* * *

在未經說明的情況下拋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斯大林分子同時拋棄了革命綱領。他們對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們說：“你們的條件就是我們的條件。”他們放棄了對他們的盟友的批評。他們乾脆為了這個聯盟而放棄了他們的綱領和他們的策略。不過，當問題是防禦共同的死敵時，而且聯盟的每一方追求的都是自己的生存利益時，防禦是不需要任何一方為這個聯盟付出任何東西的，每一方都有保留它自己的權利。斯大林分子的所作所為的性質似乎是想暗示社會黨的領袖們：“要求更多點兒，擠得更狠點兒，別不好意思；幫助我們盡快擺脫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困擾我們莫斯科主人的尖銳口號。”

拋棄工人民兵的口號。宣佈爭取武裝無產階級的鬥爭是“挑釁”。在警察局長先生的監督下與法西斯分子分享“勢力範圍”不是更好嗎？這是所有組合中最有利於法西斯分子的：當被關於統一戰線的泛泛的話語催眠的工人參加遊行時，法西斯分子會增加他們的幹部和他們的武器儲備，會從群眾中吸引新的預備隊，在他們選擇的適當時機發起進攻。

這樣，對法國的斯大林分子來說，統一戰線是他們對社會黨投降的形式。統一戰線的口號和方法是對波拿巴政府的投降，後者又是在為法西斯主義開闢道路。通過統一戰線，兩個自保的官僚不無成功地保護自己免受“第三種力量”的干擾。很快即將面對決定性事件的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狀況就是這樣。如果沒有群眾的壓力和社會黨內各派的鬥爭的話，這個狀況可能是致命的。

* * *

誰說第二和第三國際都註定滅亡，未來屬於第四國際，他表達的思想的正確性，已經被法國的當前形勢所再次證明。但這個本身正確的思想沒有告訴我們，第四國際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和在什麼期間內建成。它可能由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統一所誕生——這在理論上是不能排除的，通過在戰火中的人員重組、進一步清洗和鍛煉隊伍的方法。它也可能通過社會黨內的無產階級核心的激進化和斯大林主義組織的分解而形成。這可能在反法西斯鬥爭和戰勝它的過程中形成。但它的誕生也可能會晚得多，在幾年之後，在法西斯勝利和戰爭造成的廢墟和斷壁頽垣中。對所有的博爾迪加分子來說，所有這些變化、前景和階段都沒有意義。宗派主義者生活在超時空中。他們忽視活生生的歷史過程，後者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他們。這就是他們的“平衡”

⁴ 不肖之徒是用來稱呼那些敗壞其老師的學說的人。托洛茨基用來稱呼列寧病重和逝世後打著列寧學生

的旗號破壞列寧主義的人。——譯注

永遠是零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者與這樣的政治漫畫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毋須說，如果在法國存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強大組織，在當前的條件下，它就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圍繞著它聚集的獨立軸心。但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還未能成為這樣的組織。絲毫不想減輕領導的錯誤，但必須承認，同盟緩慢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由國際工人運動的進程造成的，近10年來，它遭受的全是失敗和倒退。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思想和方法**在每個發展的新階段上都得到了驗證。但作為一個**組織**的同盟，是否能夠期望它在日益迫近的結局來臨前的那段其間內在工人運動中佔據有影響的位置，如果不是領導位置的話？今天給予這個問題以肯定的答覆，意味著或是在頭腦中把結局推後了幾年，這與整個形勢相矛盾，或乾脆是寄希望於奇跡。

十分明顯，法西斯的勝利意味著所有工人組織的垮臺。將揭開歷史新的一章，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將在其中為自己尋找新的組織形式。在與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時期的性質緊密聯繫中，**今天的任務**應該具體地闡述如下：在無產階級的所有現存團體以及這些團體之間的力量的現有相互關係的情況下，如何盡一切可能防止法西斯的勝利？其中包括：同盟作為一個小組組織，不能覬覦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鬥爭中扮演獨立角色，但被正確的學說和寶貴的政治經驗武裝起來的同盟，在其中將佔據什麼位置，才能豐富統一戰線的革命內容？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實質上已經回答了它。為了積極促進革命重組和集中它的力量，同盟必須立即**在統一戰線內**佔據這個位置。在當前的條件下，它只有加入社會黨，才能佔據這樣的位置。

某些同志反駁說，但須知共產黨畢竟要革命得多。即便決定要放棄我們的組織獨立性，我們能依附不那麼革命的黨嗎？



這是主要的，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反對者的唯一理由，它依據的是政治回憶和心理評價，而不是活生生的動態發展。這兩個黨都是中派主義組織，區別是：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義是布林什維主義解體的產物，而社會黨的中派主義是改良主義解體產生的。它們之間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區別。斯分子的中派主義雖然有令人震驚的左右搖擺，它是與強大的官僚階層的地位和利益密不可分的穩定的政治制度。社會黨的中派主義反映的是尋找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的過渡狀態。

在共產黨內，無疑有數千名有戰鬥力的工人。但他們已經被徹底搞糊塗了。昨天，他們準備與真正的法西斯匪徒並肩戰鬥，反對達拉第⁵政府。今天，他們悄悄地向社會黨的口號投降。⁶被斯大林分子訓練出來的聖-鄧尼斯的無產階

⁵ 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國激進黨領袖。1933-1934（有間斷）和 1938-1940 年多次出任部長和總理。1938 年簽署了《慕尼黑協定》。—

—譯注

⁶ 相當多的共產黨員在 1934 年 2 月 6 日的法西斯分子和保皇分子的示威遊行中是與後者攜手進行鬥爭

級組織順從地向無產階級統一黨⁷ 投降。復蘇共產國際的10年的嘗試和努力沒有取得效果。官僚表明它足夠強大，可以把它的破壞工作進行到底。

賦予統一戰線以純裝飾的性質，以“列寧主義”的名義加冕放棄基本革命口號，斯大林分子延遲了社會黨的革命發展。現在，在他們的雜耍般轉折之後，他們繼續扮演他們的制動器的角色。黨內制度今天比昨天更加堅決地排除了任何復蘇它的想法。

不能把法國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比成一塊布上的兩塊料：哪一塊布更好，哪一塊更結實？必須在每個黨的發展中看它，而且要考慮到它們在當前這個時期的動態的相互關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我們的杠杆找到最有利的支點。

同盟加入社會黨能夠起重大的政治作用。法國有數萬無黨派的革命工人。他們中的不少人加入過共產黨；他們或是已經憤慨地退出，或是已經被開除。他們仍舊保持他們對社會黨的過去的態度，即不屑理它。他們同情或半同情同盟的思想，但未加入它，因為他們不相信在今天的條件下第三黨能夠發展起來。這幾萬革命工人留在黨外，而在工會內，他們也在黨團之外。

此外還應加上數百、數千名革命人民教師，不僅是統一聯合會的，還有全國工會的，他們可以成為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聯繫紐帶。他們留在黨外，對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都同樣仇恨。然而在最近一個時期，群眾鬥爭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為自己尋找黨的管道。建立蘇維埃不是削弱，而是相反，加強工人政黨的角色，因為數百萬被蘇維埃聯合起來的群眾需要只有

政黨才能提供的領導。

沒有絲毫必要把法國社會黨理想化，即把現存各種矛盾的它冒充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黨。但可以也應該把這個黨的內部矛盾指出來，作為它以後演變的依據，最終作為馬克思主義杠杆的支點。同盟能夠也應該給這成千上萬的革命工人、人民教師等作出表率，他們在當前的條件下仍有處於鬥爭潮流之外的危險。加入社會黨，他們可以極度加強它的左翼；他們可以使黨的整個演變更加富有成果；他們可以建立吸引“共產黨”的革命分子的強有力的中心，這樣就可以極大方便無產階級走上革命道路。

無須放棄自己的過去和自己的思想，但也沒有任何小團體的別有用心，明確地說出實情，那就是應該加入社會黨的必要性，不是為了巡迴演出，不是為了實驗，而是為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嚴肅的革命工作。

1934年8月

譯自網上下載的Путь выхода, 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譯。



英譯者注

⁷ 無產階級統一黨是一個短命的中派主義組織，它由被開除的共產黨員和前法國社會黨黨員組成。——英譯者注

的，他們中的部分人是在共產黨領導的老兵組織旗幟下進行鬥爭的。這是暗指 1931 年 8 月的所謂的紅色全民公決，那時德國斯大林分子和納粹一起為通過投票推翻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政府而努力。——

“勞動計劃”——致比利時共產黨員-國際主義者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 (1934)

列·托洛茨基



親愛的同志們：

毋須對你們說，我在最近幾天內十分認真地研究了你們寄來的報紙、雜誌、記錄、信件等。由於材料的出色的選擇，我有可能在相對短的期限內瞭解整體問題，和在你們的組織中產生的分歧的實質。你們的爭論的嚴格的原則性未受個人激化的影響，使人對你們的組織的整體精神，和它的道德-政治水準產生最有利的概念。我只能表達熱烈的願望，讓這個精神不僅在比利時支部中得到保持和鞏固，還能成為在我們所有支部（無一例外）中的主導精神。

我想在下面就有爭議的問題的實質表達的那些看法，既不覬覦全面，也不覬覦完整。我已遠離行動舞臺。這樣重要的因素如群眾情緒，是不能僅憑報紙和文件就對自己說清楚的：需要摸工人會議的脈搏，我是做不到的。但由於事關的是蘇維埃的一般原則，旁觀者的情況也許還有某些優勢，因為有機會超越細節，集中到主要問題上。

現在轉入事情的實質。

首先，我看不到能夠迫使我們放棄“讓比利時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的理由，我認為這是中心點。當我們第一次提出這個口號時，我們當然對比利時社會黨的性質有清楚的認識，它不想也不會鬥爭，它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習慣了在無產階級的列車上扮演資產階級制動器的角色，它害怕聯合之外的政權，因為它為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的可能性，離不開資產階級盟友。

所有這些我們都知道。但我們還知道，不僅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還有它的議會國家機器也進入了嚴重危機的階段，它含有人民群眾情緒迅速（相對的）交替的可能性，還有議會和政府組合的迅速交替。如果注意到，在第三國際比利時支部的微不足道和革命一翼極端軟弱的情況下，比利時社會黨和改良主義的辛迪加在無產階級中占絕對的統治地位，就清楚了，整個政治局勢應該對無產階級暗示社會黨政府的思想。

我們預先認為，建立這樣的政府無疑是向前邁了一步。當然不在這個意義上，王德威爾得、德·曼¹之流的政府能夠在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事業上扮演進步角色，而是在那個意義上，社會黨政府的經驗在這些條件下對發展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有十分進步的意義。這樣，社會黨政府的口號指望的不是某種極端的變動，而是相對較長的政治時期。如果社會黨在其當政之前就開始迅速削弱，把自己的影響讓位於革命黨，我們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放棄這個口號；哎，但是今天，這樣的前景是純理論上的。

¹ 德·曼（Hendrik de Man，1885-1953）比利時工黨右翼領袖，1933年終止蕭條，旨在促進生產的《勞動計劃》的作者，它贏得了比利時勞工運動的

支持。——英譯者注

無論是整體政治形勢，還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的力量對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為放棄社會黨政權的口號辯解！

無論如何都不是被華麗地稱為“勞動計劃”（更確切地應稱為欺騙勞動者的計劃）的德·曼的計劃，能夠讓我們放棄這個時期的核心政治口號。“勞動計劃”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或哪怕是半民主）保守主義的新的（或翻新的）工具。但全部實質是形勢極端尖銳，威脅社會黨本身存在的危險的極度迫近，迫使它違背自己的意志抓住雙刃武器，從民主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十分冒險的。

資本主義的動態平衡已經永遠失去了。議會制度的平衡也傷痕累累，正在坍塌。最後，改良主義的保守的平衡——這是同一個鏈條中的一環——也開始動搖，後者為了拯救資產階級制度而被迫公然放棄它。這樣的形勢在自身中蘊涵著巨大的革命機會（與危險並存）。我們不應該放棄社會黨政權的口號，而是相反，賦予這個口號盡可能大的戰鬥性質和尖銳性。

在我們之中無須說，為這個口號進行的鼓動中不應該有絲毫的虛假和做作、緩和矛盾、外交手腕、虛假的或程式化的信任。我們讓左派社會黨黨員往事業中放奶油和蜜（以斯派克²的精神）。而我們還像以往一樣使用醋和辣椒。

在寄給我的材料中看到了這種看法，工人群眾對待“勞動計劃”十分冷漠，他們處在壓抑階段，在這些條件下“社會黨政權”的口號只能讓人產生幻想，然後導致失望。在這裡沒有可能為自己對比利時無產階級各階層、集團的情緒得出明確的概念，但我認為工人一定的精神上的疲倦和消極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但

首先，這個情緒的本身不是最終的，毋寧說它具有的是期待性，而不是絕望的。當然，在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認為，比利時無產階級在幾年內都不能進行鬥爭。痛苦、仇恨、咬牙切齒的情緒在他內心積聚了很多，它們尋求宣洩。為了免於死亡，社會黨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工人運動。為了讓工人變得好說話，它需要資產者的說明。它當然對運動會超越它怕得要命。在共產國際微不足道、革命集團軟弱的情況下，在新鮮的德國經驗的影響下，社會黨等待從右邊來的直接危險，而不是從大左邊。沒有這些前提，“社會黨政權”的口號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



德·曼計劃和與它相關的社會黨的鼓動散佈幻想，並會引起失望，我們中的任何人對此都不會懷疑的。但社會黨、它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和它的計劃、它的儀式化的代表大會、它的宣傳鼓動是客觀事實：我們既不能排斥它們，也不能越過它們。我們的任務是雙重的：第一，對進步工人解釋“計劃”的政治意義，即破譯社會黨在所有階段上的手腕；第二，用事實對最廣大的工人表明，當資產階級企圖阻礙計劃實施時，我

² 斯派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比利時社會黨領袖之一（1944年起），曾任外交大臣（1936-1937、1938、1939-1947、1949、1954-1957、1961-1966）和首相（1938-1939、1946、1947-1949）。1957-

1961年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年輕時曾是“左派”，曾是比利時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左翼成員，曾與托洛茨基合作。——俄文網站編注

們與他們攜手鬥爭，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我們分擔鬥爭的全部困難，但不分享它的幻想。我們批評幻想，但不是鞏固工人的消極，不給它虛假的理論辯解，而是相反，推動工人前進。在這些條件下，對“勞動計劃”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將意味的不是消極性的加深，而是相反，工人轉上革命道路。

我想在近幾天為“計劃”本身專寫一篇文章。由於此信的極度匆忙的性質，我在此只限於寥寥數語。首先，我認為把這個計劃與法西斯的經濟政策拉近是錯誤的。貸款、重工業和能源工業的一定部門的國有化本身沒有任何法西斯的東西。由於法西斯提出的（在得到政權之前！）國有化的口號是為了與“超資本主義”鬥爭的目的，它簡單地剽竊了社會主義綱領的現成說法。在德·曼的計劃中，我們看到——在社會黨的資產階級性質下的一一被社會黨用來冒充社會主義的因素**國家資本主義**的綱領，但它能違背社會黨，變成真的社會主義的因素。

在經濟綱領本身的範圍內（“勞動計劃”），我以為我們應該把三點提到首要位置：

a)關於贖買。抽象地議論，社會主義革命不排除所有和任何形式的對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的贖買。馬克思當初曾表達過這種意思，如果“能從這個匪幫那兒贖買”（從資本家那兒），是不錯的。在世界大戰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如果注意到民族和世界經濟體今天的瓦解，以及人民群眾的貧窮，贖買就是致命的操作，它應該在開始時為新制度造成完全承受不了的負擔。我們能夠也應該用手中的數字讓每個工人都明白這點。

b)與沒有贖買的剝奪一起，我們應該提出**工人監督**的口號。與德·曼（見《比利時的辛迪加運動》1933年第11期，第297頁）不同，國有化和工人監督根本不是相互排斥的。甚至如果政府是極左的，充滿了最好的意圖，我們也將支援工人對生產和流通的監督：我們不想要官僚對

國有化的工業的管理，我們要求工人本身通過工廠委員會、工會等直接參加監督和管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經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框架中。

c)計劃對土地財產本身未置一詞。這裡必須有針對農業工人和貧農的口號。但對這個複雜的問題我力求專門談一下。

必須轉入計劃的政治方面。在此自然會提出兩個問題：a)為實現計劃的鬥爭方法（其中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以及b)對城鄉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在其刊登在辛迪加的機關刊物上的綱領性的講話中，德·曼斷然否定了革命鬥爭（總罷工和起義）。是啊，能從這些人那兒期待別的東西嗎？不管主要旨在安慰左派傻瓜的那些個別的保留和糾正如何，黨的官方立場仍是**議會克汀病**的立場。我們的批評的主要打擊應該對準這條路線，不僅反對整個黨，還要反對它的左翼（見下面）。在你們的討論中，雙方都尖銳和正確地強調了問題的這一方面——爭取國有化鬥爭的方法，因此我毋須再多談它。

我僅指出“小小”的一點。那些在靈魂上是君主主義者的人，能否認真地思考革命鬥爭呢？認為似乎王權在比利時是虛構，是嚴重的錯誤。首先，這個“虛構”是值錢的，它應該用經濟考慮來排除。但事情的主要方面不在這裡。在社會危機時代，幽靈往往會長出肉體，輸入血液。在德國由為希特勒鋪路的興登堡在我們眼前扮演的角色，在比利時可能由國王依他的義大利同事的榜樣和範例來扮演。比利時國王近期的一系列姿態明確地指出了這條道路。誰想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就應該從**消滅君主制**的鬥爭開始。不允許社會黨在這個問題上藏在詭計和保留之後。

革命地提出戰略和策略問題，但根本不意味著我們的批評不應該跟著社會黨滲入它的議會避難所。新的選舉要在1936年才舉行：在此之

前，資本主義反動和饑餓聯手三次扭斷工人階級的脖子。必須十分尖銳地對社會黨工人提出這個問題。為了加速新的選舉，只有一個途徑：通過轉變為阻礙議會議事的強烈的反對派使今天的議會無法履行其職能。不僅應該因王德威爾得、德·曼之流不發展議會外的革命鬥爭，還應為他們的議會活動絲毫不為準備、接近、實現他們自己的“勞動計劃”而鞭撻他們。在這個領域中的矛盾和虛假將最容易讓一般社會黨工人理解，但他還沒有成長到理解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

關於對中間階級的態度的問題，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因改良主義者想爭取小資產階級而指責他們，說他們以此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是可笑的。我們也想爭取小資產階級。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但正如莫里哀³所說的，雖是捆柴，但各有不同。⁴街頭小販和貧農是小資產者。但教授、獲得勳章的中等官員、中級工程師也是小資產者，應該在他們之間進行選擇。資本主義議會（不存在其他的議會）導致律師、官員、記者先生們作為饑餓的手藝人、街頭小販、小官吏和半無產階級農民的潛在的代表。金融資本牽著小資產階級律師、官員和記者出身的議員的鼻子，或乾脆收買他們。

當王德威爾得、德·曼之流說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計劃方面來，那他們指的不是它的群眾，而是它的潛在的“代表”，即金融資本的腐化的代理人。當我們說爭取小資產階級時，我們指的是把人民受壓迫的底層從它的潛在的政治代

表那裡解放出來。由於小資產階級居民群眾的絕望處境，舊的小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天主教黨等）已經千瘡百孔。法西斯明白了這點。它過去和現在都不尋求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們”的聯盟，而是把群眾從他們的影響下爭取過來，即以自己的方式，為反動的利益，完成當年布爾什維克為革命利益而完成的那個工作。現在在比利時的問題正是這樣。小資產階級政黨或是大資本家政黨的小資產階級一翼註定要與議會制一起消失，後者曾為它們製造了必要的腳手架。整個問題在於，誰引領被壓迫、受欺騙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追隨自己：在革命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或是金融資本的法西斯代理人。

正如德·曼不想要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害怕可能會導致革命鬥爭的議會的大膽的反對派政策，他同樣不想和害怕真正的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鬥爭。他明白，在它的深處隱藏著巨大的抗議、殘酷無情、仇恨的儲備，它們能夠變成革命激情，可怕的“過火行為”，即革命。為避免這種結果，德曼尋找議會盟友，受到重創的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右翼的哥兒們，他需要他們作為抵禦可能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火行為”的支柱。我們應該善於在日常事實經驗中向改良主義工人解釋問題的這一方面。爭取無產階級與城鄉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緊密的革命聯盟，但反對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和叛徒的政府內的聯合！

某些同志表達了這樣的意思，社會黨提出“勞動計劃”的本身應該會振奮中間階級，在

³ 莫里哀（Jean Baptiste Moliere, 1622-1673）法國喜劇作家、演員、戲劇活動家、舞臺藝術的革新家。把民間演出傳統和古典戲劇的成就結合在一起，創造了社會生活喜劇。作品嘲笑了貴族的等級偏見和資產者的局限性（如《可笑的才女》，1660；《女學者》，1672；《強迫的婚姻》，1664；《貴人迷》，1670；《心病者》，1673）。喜劇《答丟夫》（1664，一譯《偽君子》）揭露了僧侶的偽善面目。《吝嗇鬼》（1668）則

揭示了金錢的腐蝕力量。1665年上演的《唐璜》因有無神論和自由思想而使他遭受迫害。莫里哀的遺產具有極大的價值：他所塑造的角色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對世界戲劇文學和舞臺藝術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

⁴ 此話出自莫里哀的劇本《美第奇》。——俄文網站編注

無產階級消極的情況下，會方便法西斯的工作。當然，如果無產階級不進行鬥爭的話，那法西斯就會勝利。但這個危險不是由於計劃，而是由於社會黨的巨大影響和革命黨的軟弱。德國社會民主黨長期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為希特勒開闢了道路。純消極地阻止布呂姆加入政府，同樣為法西斯的增長創造了前提。最後，在沒有相應的群眾革命鬥爭的情況下，宣佈對金融資本的進攻，必然會加速比利時法西斯的工作。因而，問題不在於計劃，而是在社會黨的叛變的職能和共產國際的致命的角色。但由於整體形勢，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命運，把“國有化”政策強加給了比利時妹妹，所以除了舊的危險外，還展現了新的革命機會。看不到它們是最大的錯誤。應該善於用自己的武器來戰勝敵人。

只有在不倦地對工人提出法西斯危險的條件下，才可能利用新的機會。為了實現任何一種計劃，應該維護和鞏固工人組織。因而應該首先保護它們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擊。寄希望於民主政府，哪怕是社會黨領導的政府來拯救法西斯的危難，用法令來禁止它組織和武裝等，是最大的愚蠢。任何員警的禁止都於事無補，如果工人自己不學會對付法西斯的話。組織無產階級防禦，建立工人民兵隊伍是最緊迫和首要的任務。誰不支持這個口號，不實際貫徹它，誰就配不上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稱號。

* * *



現在還要說說我們對社會黨左派的態度。在此我最不想說任何蓋棺論定的話，因為我迄今沒有機會追蹤這個集團的演變。但近幾天我讀了的東西（斯巴克的系列文章，他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等），讓我產生了不好的印象。

當斯巴克應該說明合法和非法鬥爭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性質時，他把奧托·鮑威爾，即合法和非法的萎靡不振的理論家，當作權威來引用。

“告訴我誰是你的老師，我就能對你說你是誰。”但我們把理論領域放在一邊，轉向緊迫的政治問題。

斯巴克把德·曼的計劃當作戰役的基礎，毫無保留地贊成它。可以說：斯巴克不想給王德威爾得之流現在就把事情搞到分裂地步的機會，把軟弱的、尚未組織起來的左翼驅逐出黨；斯巴克为了更好地跳躍，他先退了幾步。也許，斯巴克的意圖是這樣的，但評判一個政治家不是根據他的意圖，而是行動。斯巴克在代表大會上的謹慎的行為，他十分堅決地保證為完成計劃而鬥爭，他遵守紀律的聲明本身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注意到左派反對派在黨內的地位的話。但斯巴克還做了些其他的：他不僅在計劃的抽象目的上，而且在具體的鬥爭方法上，表達了對王德威爾得的道義上的信任和政治上與德·曼的團結一致。

斯巴克說，我們不能要求黨的領袖們公開地對我們說自己的行動計劃，自己的力量等，這些話帶有格外不能容忍的性質。為什麼不能？出於保密？但如果王德威爾得和德·曼有所保密的話，那也不是與革命工人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和資產階級政治家反對工人的秘密。是啊，誰也不要求在代表大會上公佈地下工作的秘密！需要提供動員群眾的總體計劃和鬥爭前景。斯巴克以自己的聲明幫助了王德威爾得和德·曼回避答覆最重要的戰略問題。在此完全有權說反對派領袖與多數派領袖反對革命工人的密謀。斯巴克被引上中派主義輕信的道路和“青年社

會主義近衛軍”這一事實，更是加重了他的罪過。

在布魯塞爾聯盟的代表大會上就憲法和革命鬥爭作出了“左”的決議。決議很弱，它具有司法性，而不是政治性，它是律師寫的，而不是革命家寫的（如果資產階級破壞憲法，我們就……）。“左”的決議不是嚴肅地提出準備革命鬥爭的問題，而是對資產階級提出文字威脅。但在代表大會上發生了什麼？在德·曼——我們知道，他認為革命鬥爭是有害的神話——的幾個最空洞的聲明後，布魯塞爾聯盟馴服地撤銷了自己的決議。如此輕易地滿足空洞和虛假的言詞的人，是不能認為是嚴肅的革命者的。懲罰很快降臨。第二天，《人民報》這樣注釋代表大會的決議，說黨將嚴守憲法框架，即將在金融資本在國王、法官和員警的協助下給它指出的框架內“進行鬥爭”。左翼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者行動報》真是因此而淚流滿面：須知昨天，就是昨天，對布魯塞爾決議還是“所有人”完全一致，為什麼今天可笑的哭訴！“昨天”欺騙左翼，是為了讓他們撤銷決議。而“今天”飽經世故的官僚機靈人給倒楣的反對派一個教訓。活該！這些事從來都是這麼做的。但這僅僅是花，果實還在後面。

社會黨反對派闡述極左的批評，只要這不讓它承擔任何責任，這已經不止一次了。但當負責的時刻（群眾罷工運動、戰爭威脅、國家政變的危險等）到來時，反對派立即放下旗幟，為劣跡斑斑的黨的領袖們提供新的信任貸款，以此證明，它本身與改良主義骨肉相連。現在，比利時社會黨反對派經受第一次嚴肅的考驗。只能說，它馬上就摔了大跟頭。我們應該認真和沒有成見地追蹤它今後的腳步，在批評中不誇大，別轉向荒謬的“社會法西斯”的嘰嘰喳喳聲，但別對這個集團的理論和戰鬥鍛煉抱任何幻想。為了幫助左派反對派的最優秀成員前進，應該如實地說出一切。

* * *

為了讓這封信能在1月14日會議前到你們的手上，我寫得很匆忙：它的不全面，也許還有闡述的不夠系統，都是由此而來的。在結束時，我允許自己表達熱烈的信心，即你們的討論將以**能夠保證行動的充分一致的一致通過的決議**而告終。整個形勢預先決定了你們的組織在最近一個時期的巨大增長。如果社會黨反對派的領袖們徹底投降的話，無產階級革命一翼的領導將完全落到你們的肩上。如果相反，改良主義黨的左翼前進，走向馬克思主義，你們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戰鬥的盟友和通向群眾的橋樑。在明確和一致的政策條件下，你們的成績是完全有保證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比利時支部萬歲！

格·古羅夫
1934年1月9日



譯自網上下載的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Peuple», 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譯。

革命教師的任務——致莫里斯·多芒熱的一封信* (1934) 列·托洛茨基



親愛的同志：

在這封信中，我試圖對我們幾天前討論的問題進行總結，它是所有法國教師，尤其是教師聯合會所關注的。

我抑制不住重申：蒙慕梭¹這個不擇手段或沒有思想的在繃索上跳舞的演員，在兩個聯合會合併的問題上為我們設下了陷阱，為統治勞工總聯的官僚的聲譽和“會員”工作的考慮而犧牲工會和革命考慮。他們的轉向與真誠地接受統一戰線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據我們所能得出的結

論，兩個手腕在陰暗的遊戲中交織在一起：其中寬一些的迎合蘇聯外交的目的，窄一些的假定是為了“滿足”共產國際的冒險主義的。當權的蘇聯官僚的半官方的學說試圖用西方無產階級的保守性來解釋共產國際的失敗，這個失敗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可爭辯的。如果改良主義者習慣於說布林什維主義不適用於歐洲的話，共產國際的破產者現在則聲稱歐洲無產階級對布林什維主義來說還不夠好。在這個結果中，像在其他許多結果中一樣（這裏有三個難以辨認的詞），西方共產主義代表的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當共產國際的失敗變成了西方無產階級的失敗，當權的官僚得出結論：“為了蘇聯的安全，我們在其他地方尋找幫助。由於保守的無產階級依戀民主，我們除了讓我們也依戀它，支援和保衛民主外，沒有任何其他辦法。”我們革命者則說：“在工人相信民主的情況下，我們準備和他們一起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危險；但我們從來沒有忘記我們對民主幻想的批評。”斯大林分子輕率地浪費了批評的權利，因為對他們（蘇聯官僚）來說，問題不是領導無產階級通過民主階段走向奪取政權，而是保證自己的國際民主的支持，這是他們的唯一現實的目的。法國的民主體現在

* 譯自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35)，pp.65-68。

此文摘自皮埃爾·布魯耶 1967 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法國共產主義運動》1934 年 8 月，托洛茨基在諾亞瑞秘密會見莫里斯·多芒熱、讓·奧拉斯和吉爾貝·塞雷，他們是隸屬於統一勞工總聯盟的教師工會的領袖。托洛茨基希望勸說他們加入法國社會黨，並對統一聯盟與全國職工會——隸屬於勞工總聯盟的教師工會——統一的談判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然後加入其中。他在這些問題上沒有從他們那裏得到太大的進展。這封致多芒熱的信是在兩天後寫的，它是通過雙方的朋友傳遞的，而不是郵局。出於安全理由，沒有署名，也解釋了托洛茨基用“我們”來稱呼老師的原因。托洛茨基繼續討論的努力沒有得到多芒熱和其他老師的回應。——譯者注

¹ 蒙慕梭（Gaston Monmousseau，1883-1960）1945-1960 年為法國總工會書記，1926-1937 年為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25 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26-1945、1956-1960 年為法共中央委員，1932-1945 年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譯注

激進黨²身上，沒有社會黨的支持，它是不能進行統治的；反過來，這個黨只有在共產黨員“住口”的條件下，才把這個支持引向激進政府。蘇聯官僚的壓倒一切的計劃是重建“蘇聯的朋友”埃裏奧的體制，在列昂·布呂姆的幫助下，用所謂的統一戰線的機制來避免多列士³的批評。這是電報授意的巨大轉折的主要刺激。

為平息庫恩·貝拉⁴型的共產國際的左翼，他們說：“這僅是個謀略，管住你的嘴，等著；等時候一到，我們就會打破統一戰線，趁社會黨的領袖們沉睡不醒時抓住他們，讓他們的工人跟我們走。”

這是兩個交織在一起的手腕。乍看起來，第一個是可操作的。但如果民主前景導致無路可走時，大官僚分子總會離開它，並同意最糟糕的冒險主義者庫恩·貝拉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統一戰線。

在這個雙重的，也許是三重的安排中，蒙慕梭的位置在哪裏？我對此一無所知，蒙慕梭本人對此知道的也不比我多。不過，他十分熟悉斯大林主義階段上的操作，不害怕支撐這個轉折的精緻結構會垮到他的頭上。他在執行命令時，他會真的喜歡拖延事情，躲避並讓事情減速，原因就在於此。這樣，他能夠把拖延兩個聯合會立即合併的逃避性的和危險的決議強加給蒙彼利埃代

表大會⁵。把決定推到1935年1月是不嚴肅地對待世界和自己，由於接下來的幾個月必將帶來更加嚴肅的決議。

有一件事要弄清：法西斯危險不是一個宣傳公式；它是一個很快表現自己的不祥的現實。《人民報》和《人道報》宣稱“統一戰線早已迫使法西斯分子退卻了”，這除了幼稚或恬不知恥吹噓外，什麼都不是。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像所有這類歷史過程一樣，都是由痙攣的跳躍和糾纏完成的。我們處於兩個痙攣之間，這是當前形勢的真正的鑰匙。在1935年1月1日前，蒙慕梭是不能成功地“推開”第二個跳躍的。



² 激進黨或激進社會主義者，既不激進，也不是社會主義者，它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主要資本家政黨，類似於美國的民主黨。——英譯者注

³ 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1930-1964 年任法共總書記，1964 年任主席。1920 年加入法共，1924 年起為法共中央委員，1925 年起為政治局委員。1928-1943 年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35-1943 年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40-1944 年為抵抗運動的組織者之一。1932 年起連任國會議員。1945-1947 年曾在政府任職。有關於當代工人和民主運動方面的著作。——譯注

⁴ 庫恩·貝拉（Bela Kun，1886-1939）匈牙利共產黨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1919 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和陸軍人民委員。1921 年起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等職。1937 年被捕，遭受酷刑，1938 年被判處死刑，次日執行。——譯注

⁵ 在當時舉行的統一聯盟的蒙彼利埃代表大會上收到了全國職工會的兩個集團立即合併的建議。在蒙彼利埃代表大會上，這個建議只得到 37 票，390 票贊成只有在獨立、自由表達意見、承認少數代表和承認階級鬥爭的基礎上才能合併。蒙慕梭代表統一勞工總聯盟領導出席會議，他站在蒙彼利埃代表大會的多數一邊，即反對立即合併。——英譯者注



法西斯的勝利將首先意味著粉碎革命教師的幹部。甚至在它著手整工人組織之前，法西斯反動派用棍棒為自己在抵抗的文職人員和教師的頭腦中開路。無所事事的饒舌者對我們說：

“危險並非迫在眉睫，法國不是德國，法國的氣質是不會讓它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會嚴肅地對待這樣的愚蠢的。法西斯主義不是民族氣質，而是社會鬥爭的產物。當法國資本主義被逼到牆角時，法西斯主義對它來說就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民族氣質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情況下，法國的法西斯制度會索要比它在所有其他地方都多一倍乃至十倍的犧牲。法國歷史的所有階段都見證了血腥鎮壓，這並非偶然。

我們的有3000會員的聯合會首先被勝利的反動所吞噬。生理上的自衛迫使我们結束我們的孤立，並與全國工會合併。我們失去的每一天都是無可挽回的損失。對，我知道，我們正在放假，我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快樂地享受它。當我們環視四周，就會有忘記危險的值班農民的印象，他在維蘇威火山會席捲他的全部財產、他們的勞作以及他們本人的致命的爆發前不久，還在山腳的斜坡地上耕耘。

我們應不惜代價尋找某些手段來推翻勞工總聯盟強加給蒙彼利埃代表大會的危險決議。這是戰時，正常手續，哪怕是最值得尊敬的，都必須服從最高需要。對我來說，我相信，普通會員充分依賴的聯合會領導的大膽的首創精神，會得到聯合會的壓倒多數的。兩個聯合會的合併——在這方面我同意德爾馬⁶——會為整個工會運動的統一提供強有力的推動，粉碎儒奧和蒙慕梭的罪惡意願。



當然，我們與勞工總聯盟合併是為了促進對教師的革命動員。我們必須制定準確、有力和適應形勢的行動綱領，原因就在這裏。法國社會黨領袖保羅·富爾⁷的表演就是證明，面對法西斯騷亂、俱樂部和機槍，他宣揚佛學和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的理論！對他來說，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任務仍是贏得多數（51%）。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最多得票是44%。我們懷疑保羅·富爾的創紀錄的能力。哪怕一個人完全徹底地依賴民主基礎獲得51%的選票，這一可能性也必須通過反法西斯的武裝防衛而得以保障，正如工人被迫用糾察隊來保衛最節制的罷工一樣。資產階級虛偽地說：“國家安全要求武裝國家。”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保證無產階級民主產生了對政權的要求，最主要的是武裝工人，首先建立工人民兵。”

⁶ 德爾馬（Andre Delmas，1899-1979）社會黨人、教師，1932年至1940年全國教師聯盟秘書長，強烈支持合併。——譯注

⁷ 富爾（Paul Faure，1878-1960）是1920年反對加入

共產國際的法國社會黨少數派選舉秘書長，領導這個機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44年，他因在戰爭期間與維希合作而被法國社會黨開除出黨。——英譯者注

我們在這裏看到多列士、加香⁸和蒙慕梭急忙保衛保羅·富爾的托爾斯泰的理論，似乎只有“托洛茨基內奸分子”才會挑動武裝的無產階級對抗武裝的反動派！可恥愚蠢的詭辯！所有那些昨天還把整個法國（至少是《人道報》的法國）描繪成街壘和革命戰鬥的法國的人的嘴裏說出的話，比這有過之而不及。在這個問題上，轉變最明顯地表現在共產黨和勞工總聯盟的官僚對蘇聯外交的奴隸般的依附上。多列士打算用“整個無產階級的自衛”來取代武裝的工人民兵。你確信！在這個方案中，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角色會變成什麼？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民兵就什麼也不是，但沒有民兵，面對法西斯的打擊，階級也無能為力。民兵是一支積極的軍隊，階級是它的巨大的後備力量。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常識被拋棄了，它們被踐踏，被誣衊為“布朗基主義”。而教師的自衛，我對此充滿信心，必須把教師變成工農民兵的熱情的宣傳者和不知疲倦的組織者。而這個民兵的目的，是保衛受壓迫群眾，他們的組織、集會、出版、他們的民主權利和社會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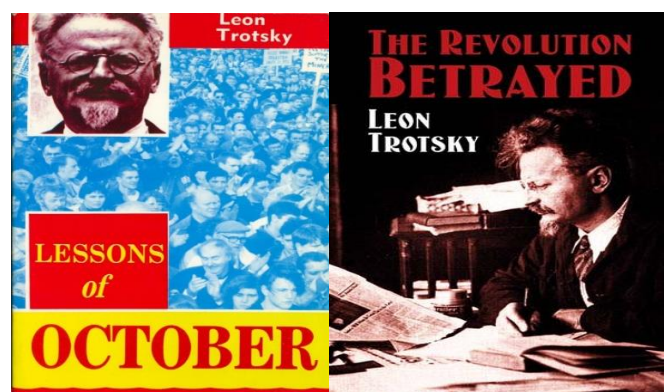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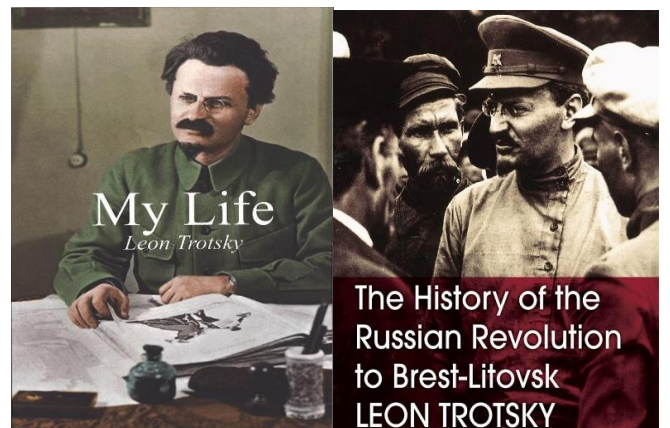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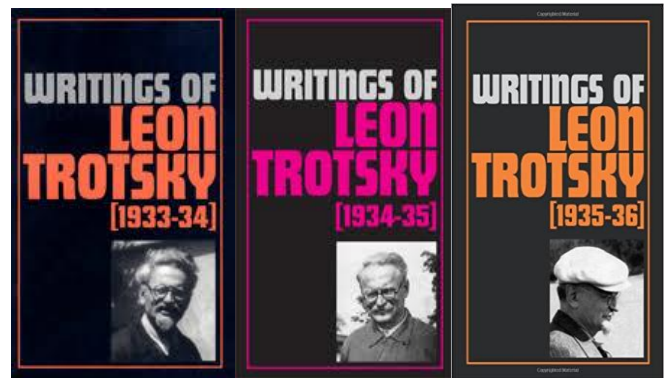
在這封信中我所說的一切並不充分。我希望對熱點問題的觀點交流的開始，會直接關係到我們的聯合會，但它隱含的意義要深遠得多。在你們和其他同志的意見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東西，我準備依次答覆。假期絕不是讓我們睡覺的。來自盧瓦-因費裏耶的議員戈塞羅以及來自因德爾的議員富格雷早已提出了關於教師的問題。反動派沒有浪費時間，讓我們也別浪費我們的時間。

致以誠摯的敬禮！

1934年8月10日

⁸ 加香（Marcel Cachin，1869-1958）法國和國際共運活動家，法國共產黨創始人（1920年）之一。1920年起當選為法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24-1943年

本文譯自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35)，pp.65-68。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譯。



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05-1920年為法國社會黨領導人之一。1940-1944年參加抵抗運動，1918-1958年任法國《人道報》社長。——譯注

Floods,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Qing Yan

Floods

On 3 September 2020,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held a regular policy briefing regarding the arrangements that were made at the recent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for flood prevention, disaster relief and post-disaster recovery. Zhou Xuewen,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Command Headquarters, deputy minister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eputy minister of Water Resources, indicated that since 1998, China has suffered the most severe floods. 751 rivers in 25 provincial regions have experienced floods with major rivers and lakes like the Yangtze River, Yellow River and Lake Taihu visited by 18 numbered floods. China has received 555.6 millimeters of precipitation, almost 10.6 percent more than the averag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is year's precipitation is the second worst since 1961, exceeded only by 1998 Flood.

The wide-ranging, long-lasting floods have affected 70.4 million people in 28 provincial regions, which increased 17 percent from the five-year averag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the disasters have increased by 27 percent from the five-year average to almost 214 billion yuan (\$31.3 billion). However, the death toll or missing in floods decreased 49.8 percent from the five-year average to 271. About 4.7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47.3 percent more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have distributed almost 1.5 billion yuan of disaster relief funds and about 195,000 disaster-relief materials have also been dispatched to the affected regions.

Urbanization

Sichuan province was particularly seriously affected, for example Leshan City and Jintang County of Chengdu Cit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quality of flood control facilities in many cities is inferior.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is rapid urbanization. In 2010, Chen Weizhong, an expert of irrigation, pointed out that the rainfall could not go down through hard surfaced road to become underground water. Due to rapid urbanization, rivers, streams, ponds, and farmland have been occupied and destroyed, which has limited the capacity to channel floodwater.

Climate Change

On 24 August 2020,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issued *Blue Book on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2020*, which provided the latest monitoring information on the climate change status in China and the whole world from the aspects of atmosphere, hydrosphere, cryosphere, terrestrial biosphere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limate change.

The Blue Book indicates that many key indicators of the climate system are taking on accelerating changes. China, as a region susceptible to climate change, is confronted with more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 pronounce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recipitation changes, and more days of rainstorm. It boasts a bettering ecological climate but faces more unstable conditions in term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in 2019 is 1.1°C higher than that of pre-industrial levels, ranking second since the complet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on record. Since the 1980s, every consecutive decade has witnessed warmer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one. In 2019,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on average in Asia came seco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1951 to 2019,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n China had risen by 0.24°C per decade, with the rate dramatically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level in the same period.

From 1961 to 2019,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in China is on mild increase, with more extreme heavy rain events and more days of rainstorm. Precipitation changes in all regions take on noticeable differences. From 1870 to 2019, average glob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has notably risen. In 2019, global average sea level is accelerating its rise. The sea level change in coastal regions of China is on volatile rise. The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level in the same period. From 1960 to 2019, global mountain glaciers are in melting and retreating condition. The year 2019 is the most intense year of global glacier melt since 1960.

Concluding remarks

In 2018,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ssued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 °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The scientists remarked that there was emerging evidence of human influence on global atmospheric moisture content and precipita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ship, the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increased approximately exponentially with temperature. It was physically plausible that relative humidity would remain roughly constant under climate change. This meant that specific humidity increased about 7% for a one degre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in the current climate.

In 2010, Chen Weizhong warned that in the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the cities have reduced their capacity to control floodwaters. Same or lesser volume of rainfalls would lead to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 summary, rapid urbanization makes floods worse. Thus, de-urbanization/de-industrialization is one of the key solution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serious floods.

Let the mischief-maker undo the mischief.

Reference:

1. Hou Liqiang, “Despite floods, casualties half 5-year average”, *China Daily*, 4 September 2020.
2. “Blue Book on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2020 rolled out”, *China Meteorological News Press*, 28 August 2020.
3. “Changes in Climate Extrem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Natural Physical Environment”, IPCC,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3/SREX-Chap3_FINAL-1.pdf

香港	2	名為保勞工就業，實則保財團進帳	韓則鳴
中國	4	大洪水、城市化與氣候變化	青岩
國際	8	現在讓我們向生態社會主義過渡吧!	第四國際
	12	階級和種族不平等、健康和COVID-19	K曼
	18	新冠病毒：生態觀點	艾倫·索內特
	23	經濟危機的原因只是新冠病毒大流行？	雅各·舍費爾
專題	31	托洛茨基：世紀明燈	丹尼爾·本賽德
	33	為第四國際而鬥爭——致所有革命無產階級組織和集團的一封信(1935)	列·托洛茨基
	39	出路 (1934)	列·托洛茨基
	44	“勞動計劃”——致比利時共產黨員-國際主義者支部 (1934)	列·托洛茨基
	50	革命教師的任務——致莫里斯·多芒熱的一封信 (1934)	列·托洛茨基
英譯	54	Floods,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Qing Yan

OCTOBER REVIEW VOL. 47 ISSUE 1/2 2020.9.1

Hong Kong

2	Employment Support Scheme as Corporate Support Scheme	Han Zeming
---	---	------------

China

4	Floods,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Qing Yan
---	---	----------

International

8	Let's Build the Transition to Ecosocialism Now!	Fourth International Bureau
12	Class and Race Inequality, Health, and COVID-19	K Mann
18	Covid-19: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Alan Thornett
23	Economic Crisis Only Because of the Corona Pandemic?	Jakob Schäfer

Feature

31	Trotsky, a Guiding Light of the Century	Daniel Bensaïd
33	Open Lett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o All Revolutionary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1935)	Leon Trotsky
39	The Way Out (1934)	Leon Trotsky
44	On "Plan De Man" ----To Belgian Community Party and Internationalist Sector (1934)	Leon Trotsky
50	The Tasks of Revolutionary Teachers (1934)	Leon Trotsky

English

54	Floods,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Qing Yan
----	---	----------